

551.5

8555

資本主義的動力

La dynamique du capitalisme

費爾南·布羅代爾 著

楊起 譯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Toronto
Kuala Lumpur Singapore Hong Kong Tokyo
Delhi Bombay Calcutta Madras Karachi
Nairobi Dar es Salaam Cape Town
Melbourne Auckland Madrid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4

French text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La dynamique du capitalisme*
by Flammarion © Flammarion

資本主義的動力
布羅代爾著
楊起譯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香港銅魚涌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和域大廈十八樓
ISBN 0 19 586519 7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f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f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社會與思想叢書緣起

歷史悠久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從一九九二年起開始出版中文書籍。這或許預示着：中文這一為十多億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在世界文化和學術的發展中將會日益取得其應有的地位。現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又決定出版「社會與思想叢書」，俾更有系統地積累有價值的中文學術著述和譯述，我們希望，這對於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將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社會與思想叢書」將首先着重於對中國本土社會與本土思想的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誠如人們今天已普遍意識到的，晚近十餘年來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並非僅僅只是相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甚至一九一一年以來而言的變遷，而是意味着：自秦漢以來既已定型的古老農業中國，已經真正開始了其創造性自我轉化的進程。這一歷史巨變已經將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到了中外學者的眼前，例如，鄉土中國的這一轉化將會為華夏民族帶來甚麼樣的新的基層生活共同體？甚麼樣的日常生活結構？甚麼樣的文化表達和交往形式？甚麼樣的政治組織方式和社會經濟網絡？所有這些都歷史性地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基本課題，同時恰恰也就提供了「中國傳統性」再獲新生的歷史契機。可以說，當代中國的這一歷史變革已經為中國當代學術文化的突破性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歷史可能與堅定的經驗基礎，因為它一方面使人們已能立足於今日的經驗去思考中國的未來，同時也已為人們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去再度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明、中國的傳統性。有鑑於此，本叢書將不僅強調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同時亦重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以張大「中國現代性」的歷史文化資源。

「社會與思想叢書」的另一方面則是同時注重對西方社會與思想，以及其它非西方社會與思想的研究。如果說，晚近十餘年來的中國變革標誌着「中國現代性」的真正歷史出場，那麼，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現象無疑莫過於對「西方現代性」歷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檢討：在經濟領域，所謂「福特式大生產方式」的危機不僅促發對「後福特時代生產」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們重新檢討「福特式生產」的歷史成因及內在闕失；在政治領域，西方現存體制與民權運動以來民主發展的尖銳張力，已重新激發西方近代以來「自由主義 v.s. 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這一基本辯論；在文化領域，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不但已全面動搖近代西方苦心營構的文化秩序和價值等級，而且更進而對「西方傳統性」本身發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這些都提醒人們：自上世紀末以來一直在學習西方的中國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樣全面重新檢討中國人以往對西方的理解和認識。因此，本叢書將不僅包括對當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強調對西方歷史傳統的重新認識，特別是西方傳統內在差異性的研究。

本叢書定名為「社會與思想」，自然表達了一種期望，即：對社會制度層面的研究與對思想意識層面的研究，應該日益結合而不是互不相干。從學科的角度講，亦即希望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與人文及哲學領域的研究，能夠相互滲透，相互促進。通過多學科的合作與跨學科的研究去深入認識中西現代性與中西傳統性，以往那種僵硬的「傳統 v.s. 現代」、「中國 v.s. 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或將會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類對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學術世界為此任重而道遠！

甘 陽
一九九三年十月

前言

這本小冊子刊載的是一九七六年我在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所作的三次學術報告的講稿。講稿以《對於物質文明和資本主義的反思》為題譯成英文，此後又以《資本主義的動力》譯為意大利文。本版對於原稿未作任何更動。一九七九年，阿爾芒·科蘭出版社發行了我寫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現謹請讀者注意，講稿問世在先，書稿出版於後。然而，在我講演之時，鑑於書稿已基本完成，我遂應約介紹了它的要點。

費爾南·布羅代爾

目錄

前言	VII
第一章 對於物質生活和經濟生活的再思考	1
第二章 交換縱橫談	22
第三章 世界的時序	45
附錄：終天之見 ——介紹布羅代爾在生前最後一次研討會上的言談	70

第一章

對於物質生活和 經濟生活的再思考

《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這部抱負頗大而力有未逮的長篇著述，我是在一九五〇年開始運籌的，至今已有些年頭了。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給我出了這個題目，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他友好地強加於我的。當時，他擬就了出版一套通史叢書的計劃，總題為「世界之命運」(Destins du Monde)。作為主編的他在一九五六年過世了，我不得不接續這套叢書的編纂工作，其困難自不待言。呂西安·費弗爾自告撰寫《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的西方思想與信仰》。此書本應配合與補充我的那本，與之比翼，然不幸卻永無出刊之日了。我的著述因此終古成為孤篇。

《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這本書儘管大體上只限於經濟領域，卻仍然給我帶來了不少難題，這是由於所須運用的資料浩大而繁多，由於其主題引發着諸多爭議——經濟，作為孤立的自在體，顯然是不存在的，還由於不斷演進的編史業務無休止地生發着困難，因為它情願也好，不情願也罷，雖然相當緩慢，卻必須將人類其他的科學收錄歸案。我提到的這個編史業務不斷推出新的史料，年年歲歲面貌不同，我們要跟上它，必須跑步前進，必須打亂我們慣常的勞作，必須多多少少地適從那些從不相同的規定與請求。美人魚以其動人的歌吟誘引船夫觸礁，使他們不得前進，而我呢，也被上述美人魚歌聲般的新史料迷住，甚感賞心悅耳。就這樣，時光年復一年地流去，我曾一度氣餒，不知我的航船能否抵達口岸。我寫《地中海史》，歷時二十五年，寫《物質文明》也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耗時確實太多了，過份地多了。

第一節

現今才正在修纂的、以經濟為門類的歷史遭遇上一些偏見：它不是高品位的歷史。呂西安·費弗爾新撰修的才被視為高品位的歷史；見諸於其筆端的不是雅科布·富格爾(Jokob Fugger)^①，而是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②，而是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gois Robelais)^③。與另一門類相比，不管它的品位是高，是不高，還是不太高，經濟史同樣提出了我們這個專業所固有的一切問題：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審視，經濟史就是人類整體的歷史。它是人們視之為大角色的人物，如雅克·科爾(Jacques Coeur)^④，如約翰·勞(John Law)的歷史^⑤；它是大事件的歷史，是情勢和危機的歷史，它也是整體與結構長期緩緩演變的歷史。而這，恰恰正是我們的難處所在，因為，我們涉及的是四個世紀和整個世界，如此大量的事實和解釋，怎樣組織才好呢？必須進行篩選。就我而言，我選擇了長期形成的深

① 雅科布·富格爾(Jokob Fugger)：德意志一個大實業家族(延綿 14, 15 和 16 三個世紀)中一位重要成員。該家族所辦的企業是資本主義初期貿易公司的典範。

②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德國人，十六世紀歐洲宗教運動的發起者，基督教新教的創始人。在基督教歷史和西方文化史上都是重要人物。

③ 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gois Robelais 1483—1553)：法國作家。他的淵博的人文主義學識為他贏得了終身聲譽。他對法、英兩國的一些作家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④ 雅克·科爾(Jacques Coeur 1395—1456)：法國商人，國王查理七世的顧問，曾任國家財政總監。科爾是他那個時代的代表人物，體現了商人中等階級的興起。

⑤ 約翰·勞(John Law 1671—1729)：蘇格蘭貨幣改革家，開發了美洲法屬領地的「密西西比計劃」的制定者。他曾在巴黎創辦一家有權發行紙幣的銀行。

層次的均衡與失衡。在產業革命前的經濟中，依我之見，首要的義理就是當時那種仍然是初級的經濟所蘊含的刻板、鈍滯和艱澀，與一種現代化發展所引發的有限的、參與人數不多的、然而卻活生生、強有力的運動共存共處。一邊是村落中的農民，他們過着絕少與外界來往、幾乎是完全自給自足的生活；另一邊是正在伸展着的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它們在蔓延，在一點一點地鑄造着並且也已經預示着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總之，至少有兩個天地，兩種陌生的生活，而其各自的實體卻又互成因果。)

我想首先談一談鈍滯現象。這東西看上一眼看不大明白的，處於人的清醒意識之外。人在鈍滯的狀態中，被驅動的成份遠較能動成份為多。這就是我的著述第一卷所試圖湊合着解釋的東西。在一九六七年初版時，我曾將此卷題之為《可能的與不可能的：面對着日常生活的人》，爾後我又改成《日常生活的結構》。當然，書名無關宏旨。即使這種追尋看來沒有把握，處處可能出現漏洞、陷阱和誤區，研究的對象卻是再清楚不過的。說實在話，一切使用過的字眼——無意識、日常性、結構、深層——其本身就是隱晦不易懂的。關係到我們這個題目，答案不可能就是心理分析學中的無意識，雖然這個無意識與此也有關係，雖然有一種集體無意識或許值得了解一下。卡爾·古斯塔夫·容格(Carl Gustav Jung)^①研究集體無意識的實質，被折磨得好苦。言歸正傳，鈍滯這個大題目，少有不從其短處涉及的。它仍等待着歷史學家來研究它。

至於我，仍執著於具體的標準。我起步於日常生活，起步

① 卡爾·容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瑞士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證實了弗洛伊德的許多論點。一九一六年發表了《無意識心理學》。後來提出了無意識和原始意象等概念。

第一章 對於物質生活和經濟生活的再思考

於那些生活中對我們盡責、而我們竟不知曉的東西。(習慣——稱為老套數更好——即那些千般萬種的自發自止的行為。對於這些行為，任何人都不用事先決定是幹還是不幹，它們確實是在我們充分的意識之外進行的。我認為人的生活一大半淹沒在日常瑣事中。無數的行為都是自古繼承下來的，無章無序積累的，無窮無盡重複的，直至我輩。它們幫助我們生活，同時禁錮著我們，在我們整整一生中為我們作出決定，指令我們做甚麼或不做甚麼。這裡所說的有外因的挑動與誘動，有內因的衝動與博動，有模式的照搬，有採取行動的各種方式或者不得不採取行動的情況。這些東西有時候，甚至常常超出人們的估想，可以被追溯到久遠的混沌年代。積年累世的、非常古老並依然存活的往昔注入了當今的時代，就像亞馬遜河將其混濁的洪流瀉入大西洋一樣。)

這正是我試圖用 物質生活 這個方便的——但如同所有的因其義過廣而不確切的——詞匯所要抓住的一切。當然，物質生活只不過是人類營生的一部份，從本質上講，人既有創意，也墨守陳規。但是，我要重複地說一句，在開始的時候，我並未刻意確指這種逆受多於進取的生活所具有的局限及性質。我是想看一看，也讓大家看一看這一塊平庸度過的、大體未被看清的歷史，深入進去，與之熟悉。

鑽進去之後，也只有在鑽進之去後，才是再走出來的時刻。在進行了這場水底捕撈之後，深刻的、直接的印象是我們仍處在非常古老的水域之中，仍處在一部幾乎沒有頭的歷史之中。兩三個世紀以前能夠找到的史實，十個世紀以前也能找到，甚至有時今天仍可親眼看到。我所理解的這種物質生活，人類在其先前的歷史進程中已將之深深地溶入自身的性命裡，宛如納入了人的五臟六腑。對於人來說，過去獲得的經驗和受到的毒害

資本主義的動力

都變成了日常生活的需要，變成了平庸之物。而對於這些東西，沒有人去細心觀察。

第二節

此即我首卷書的主綫。其目的是進行一番探索。光看標題，各章的內容也就不言自明了。標題如清單般地開列出催化着並推動着物質生活總體前進、而且在此之外或在此之上也推動着人類整體歷史前進的隱濛不顯的力量。

第一章：「人口數量」。推動人和其他一切生物繁衍生息的因素，乃是傑出的生命之力。喬治·勒費弗爾稱之為「向春性」。當然，此中尚有其他的向性和定數。構成人類的物質處於永恒的運動之中，它在個體的人並不知覺的情況下，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人類群體的命運。在這樣或那樣總的條件之下，人類各大群體的數量或者過多，或者不夠多，多多少少，交替產生。人口發展的機理是趨向平衡的，然而臻至平衡的情況頗為少見。在歐洲，從一四五〇年起，人口快速增長，這是因為應該、而且當時也可能補償上一個世紀黑死病所造成的大量死傷。局面得到了恢復，爾後又折丁損員。在歷史學家的眼中，如同預期的一樣，人口之潮漲漲落落，落落漲漲，勾劃揭示出有傾向性的規律，這些長期規律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至此，不可逾越的界綫才被沖破。從那時開始，人口便不斷增長，沒有停滯，沒有反向運動。

總而言之，在十八世紀之前，人丁系統被圍在一個幾乎不可捉摸的圈子裡。人口數量剛要觸及到圈子的周邊，幾乎馬上就出現退縮。恢復平衡的方式和時機並不缺乏：匱竭、災荒、饑

第一章 對於物質生活和經濟生活的再思考

饉、苦日子、戰爭，還有特別值得一提的種種疾病。現今，疾病仍在為害，而昔日，疾病卻是浩劫之災：定期流行的鼠疫遲至十八世紀才被驅出歐洲；斑疹傷寒，再加上嚴冬，將拿破崙及其大軍困於俄羅斯的腹地；傷寒和天花經常施虐；早先出現在鄉村的結核病於十九世紀侵入城市，變成了那個浪漫時代的時髦病，最後是性病，在發現美洲新大陸之後，由於幾種細菌的結合，梅毒又獲得新生，甚至大規模地突發起來。差勁的衛生條件和劣質的飲用水則造成了其他的危害。

人，嬌嫩嫩地生下來，怎能逃脫這一切侵害？嬰兒死亡率極高，情況如同今天的某些發展中國家，或如同昨天的發展中國家。普通的衛生狀況岌岌可危。我們擁有十六世紀以來的數百份解剖報告。讀後令人震驚不已。報告中對於肢體和皮膚變形和損傷的描述，死者肺部和腹部中超量的寄生蟲，能把今天的醫生驚呆。所以說，直至不久以前，一種有害健康的生活狀況無情地貫穿着人類歷史。當我們琢磨「那時有多少人？」「他們有甚麼病痛？」「他們能防治嗎？」等問題的時候，我們應該想到上述的境況。

第一章之後的章節提出了其他的問題：他們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住甚麼？都是些沒頭沒腦的問題，不做一次考古勘察恐怕難以作答，因為，你們都知道，傳統歷史籍冊並不記載人們吃甚麼，喝甚麼。而在許久之前就有這樣一種說法：*Der Mensch ist was er isst*〔其食造就其人〕，這也許是用德語做文字遊戲所得到的趣味之作，然而，我不認為應該將那麼多的食品——從糖、咖啡、茶到酒——的出現看作是細枝末節。實際上，它們每每都是說不完的豐富歷史。人們無論如何不能過份渲染谷類——古老食品中的當家作物——的重要性。小麥、大米、玉

米是非常古老的遴選和無數連續試驗的產物，在歷時千百年的「導生」（法國最大的地理學家皮埃爾·古魯的用詞）作用下，這些遴選和試驗遂成文明的取向。（小麥消耗地力，要求土地有規律地休閒，因此它就帶動了並且使人們有條件從事畜牧：若是沒有家畜、犁具、挽具和大車運輸，我們怎能想象歐洲的歷史？稻谷是在園藝中培植出來的，一茬接一茬，人們就沒有多餘的土地放養牲口了。在一日三餐中，煮玉米吃自然是最方便、最簡單的飯食了。玉米使人們有了閒暇，因此出現了農民輪流值勤的雜役隊，因此才有了美洲印地安人的宏偉建築。派不上用場的那一部份勞力被社會徵用了。）此外，我們還可以討論上述作物在食譜中所佔的份額和所提供的熱量，可以討論歷代食譜的不足之處和變化。與查理五世(Charles V)帝國的前途相比，或者與路易十四時代的所謂法國獨領風騷的短期而有爭議的光輝相比，難道這不是一些同樣引人入勝的活題嗎？當然，這是些產生過嚴重後果的話題：酒、煙草等古老興奮劑的歷史，尤其是煙草風靡世界之勢，難道不是在警告我們對於今天更具危害性的興奮劑要倍加警惕麼？^①

關於技術，我們看到了同樣的現象。技術確是一部令人讚嘆的歷史。它和人類的勞動，和人類日常在與天和與己鬥爭中所取得的很緩慢的進步密不可分。為了做一件工具或造一件武器而磨石、刻木、打鐵，或使用猛勁，或和緩而單調地運力，這一切都是技術，歷來如此。這不正是一種非常基礎的、從本質上講是保守的、變化緩慢的、由科學（是其遲到的上層建築）慢慢接應的活動嗎？經濟上的大規模集中喚來了技術手段的集中和技藝的發展：十五世紀的威尼斯兵工廠如此，十七世紀的荷

① 查理五世(Charles V 1550—1558)：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

第一章 對於物質生活和經濟生活的再思考

蘭如此，十八世紀的英國亦然。每次風雲際會都少不了科學，不管它是如何的稚拙。科學是被硬拉進來的。

一切單項技術，一切科學因素歷來在世界範圍內交流，周游世界，傳播不斷。然而，多種技術的聯結體和組合物傳播得並不好：光有艉柱舵不行，還要加上搭接法^①製造的船殼，還要給船加上火砲，還要掌握遠洋航海術。同樣，資本主義是各種手法、程序、習慣、競爭性能的總和。遠洋航行和資本主義並未整體傳播。是不是基於這樣一個簡單的原因才使遠洋航行，才使資本主義鑄成了歐洲的霸權呢？

好了，也許你們要問我，你為甚麼要用本卷的最後兩章論述貨幣和城市？因為我不想在第二卷中論及此事，就是這樣。但是，單單這個理由顯然不足以服人。道理在於，貨幣和城市滲浸於不入記憶的日常性和最新最近的現代性。貨幣是一項非常古老的發明，在這裡，我是把它作為加速交換的手段而談論它的。沒有交換，也就沒有了社會。至於城市，史前即已存在。城市乃是最普通生活的古久累世的結構。城市是一些能夠適應變化，能夠強勁助變的增殖器。可以說，城市，還有貨幣，造就了現代性，而同時，根據喬治·古爾維奇(Georges Gurvitch)^①所鍾愛的對等法則，現代性，即人類生活中運動着的組合，又推進了貨幣的擴展，造就了城市日益增強的專制。城市與貨幣既是發動機，也是顯示器；它們引發變化，它們也顯示變化。它們又是變化的後果。

① 喬治·古爾維奇(Georges Gurvitch 1894—1965)：法國社會學家，主張社會學應該從整體上來分析社會現象

第三節

如此說來，勾勒出遼闊的習慣性、或曰例行性王國的輪廓，不是件容易的事。這是一個「未入青史」的王國。習慣性實際上蔓及人類生活的全部，在人類生活中擴散傳播，如同夜晚的黑暗籠罩着景物。但是，在這種昏暗中，在這種記憶與清醒的短缺中，同時存在着較暗的區域和較亮的區域。在黑暗與光明之間，在不動腦筋地按老套行事和意識清醒地作出決定之間，劃清界限是很重要的。界限認準了，觀察者就得以區分左右了，甚至進一步區分上下了。

對於一個地區來說，它所擁有的全部初級市場就是一大群銷售平平的網點，請你們將之想像為巨大而複雜的網面。我們所稱的交換經濟始自這些多種多樣的出口。生產是個大領域，消費也是個大領域，交換經濟就鋪展在二者之間。在舊制度(*Ancien Régime*，指法國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之前的王朝——譯注)所經歷的幾個世紀中，具體地說在一四〇〇年和一八〇〇年之間，交換經濟仍極不完善。也許，由於淵源不長它尚處於蒙昧時代，反正它做不到將全部產品與全部消費對接起來，因為很大一部份產品被自家或本村用掉了，進不了市場渠道。

在理所當然地顧及到這種不完善的情況之後，我們必須說明，市場經濟在進步，它溝通了足夠多的鄉鎮與城市，已經開始組織生產，引導和支配消費。要完善起來，大概需要幾個世紀的功夫，然而，在兩個世界——產生一切的生產世界和耗損一切的消費世界——之間，市場經濟是紐帶，是馬達，是狹窄但活躍的區域。刺激、活力、新事物、創舉、各種覺醒、增長、甚至進步皆由此湧出。雖然我並不完全同意，我卻欣賞卡爾·

第一章 對於物質生活和經濟生活的再思考

布林克曼的見解，他認為，經濟史概括起來就是一部從頭至尾的市場經濟史。

因此，我長時間地觀察、描述我所能觸及的初級市場，勾起人們對初級市場的追念。初級市場劃出了一條經濟界線，標定出一個下限。在市場之外的一切東西只有使用價值，進入了市場狹窄之門的一切東西便獲得了交換價值。個體的人是個「因子」，他在初級市場的內與外就決定了他是否被納入了交換領域，是否被納入了我稱之為的「經濟生活」。我說的這個經濟生活是與「物質生活」相對而言的，與「資本主義」也是有區別的。這一點我們下邊再討論。

流動的匠人，走村串鎮，幹點修椅子或打煙囪之類的活計，雖然是極普通的消費者，卻屬於市場天地。他是向市場要他那口飯吃的。如果他和他的老家保持着聯繫，在收穫糧食或收穫葡萄的季節回村重操舊業，那麼，他就又跨越了市場的界線，不過是反向跨越而已。其個人到鎮上去，只是為了賣點小商品，一堆鷄蛋，一隻家禽，換了錢交稅或買個犁鏵，這樣的人只有說摸到了市場的邊。他仍在自產自用的巨大實體內。流動商販，在城鄉兜售數量不多的貨物，不管其貨流和收支是何等的寥薄，則已歸屬於交換生活，歸屬於盤算與借貸一族。至於鋪主，乾乾脆脆就是市場經濟的因子。他或者出售自造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他是個作坊工匠；他或者出售別人的產品，他從此就進入了商人的階層。店鋪總是開着門的，其長處是可以提供連續的交換，而集市每週才只有一次或兩次。再者，店鋪進行的已是附有信貸的交易，因為店主可以先進貨後交款，也可以先賣貨，後收錢。在這裡，交易過程就是一個延續的借債與放款的程序。

在集市和交易的初級因素之上，商品交易會和金融交易所發揮着高級作用。交易所是每日營業的，而交易會定期舉行，每

次開放數日，兩屆間隔的時間頗長。一般來說，交易會也接納攤販和中等商人，但是，如同交易所一樣，交易會是被大商人統治着的，這些人不管零售，被稱為批發商。

我的著述的第二卷題名為「交換縱橫談」。在該卷的前幾章中，我花了大量篇幅描繪市場經濟的各種成份，試圖詳察事物，越近越好。我可能過於樂此不疲了，讀者則可能覺得冗長。但是，寫歷史不正是應該首先描繪、直觀、分類，少些先入為主嗎？自己看，也讓別人看，這已經意味着完成了一半任務。看時要盡量親眼看。我敢向你們保證，我不講美國，而是說在歐洲，再容易不過的事情便是在某座城市的街上看到某種集市，或者看到一個樂於向你講述其漫游經歷的小販，或者看到一個展銷會，或者看到一座交易所。你們可以去巴西(Brazil)的巴俟亞(Bahia)州內地看看，或到阿爾及利亞的卡比利亞(Kabylia)地區，或者去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看看，你們還能親眼看到古代的市場。還有，如果願意閱讀的話，介紹過去交易情況的資料可就太多了，其中有城市檔案，公證人記錄，警察的文件和那麼多的游記。不消說，畫家作品也有表現。

讓我們看一看威尼斯的例子。這個城市奇迹般地保存了原貌，在城裡散散步，在檔案館和博物館轉一轉，幾乎可以把往昔的景象全部復原。威尼斯沒有交易會，或者應該說不再有商品交易會：Sensa 僅僅是耶穌升天節的節日活動，一些商人在聖·馬可廣場(Piazza di San Marco)搭了售貨棚，在聖·尼科洛(San Niccolò)一帶賣面具，放音樂，還按慣例表演總督與大海成親的故事。在聖·馬可廣場有幾個市場，其中包括價錢昂貴的手飾市場，價格也並不便宜的裘皮市場。過去和現在一樣，商業大場面呈現在里阿托廣場，廣場面對着里阿托橋和德國貨棧，貨棧今天變成了威尼斯的中央郵局。在接近一五三〇年的

時候，阿雷蒂諾(Pietro Aretino)^①的住宅就座落在大運河邊上，作為消遣，他觀賞裝載着水果和堆積如山的甜瓜的船隻，這些船從環礁湖的島嶼開來，駛向被稱為威尼斯「肚子」的新里阿托和舊里阿托連體廣場(the double Rialto Square)。那裡是一切交易、一切大小生意的活躍中心。在離連體廣場吵吵嚷嚷的貨攤不遠的地方，就是當時大批發商的「洛賈」。這座一四五五年落成的建築可被視為今日的交易所。每天上午，大批發商們在那裡秘談生意。海事保險和運費，購買，出售，相互之間或者與外國商人簽合同。離此不遠的是錢莊，在狹窄的店內，莊主們正準備通過轉賬的方式立即交易結清呢！也是在這附近，菜市和魚市今天仍然存在。更遠一點，是加夸里尼老區的一些肉店，與之為鄰的、毀於十九世紀末的聖·馬泰奧(San Matteo)是肉店老闆們的教堂。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交易所的噪雜——這裡我說的是在十七世紀——會使我們感到更不自在。何塞·德維加(José de la vega)寫過一本令人驚嘆的書，題為《亂上加亂》(Confusión de confusiones, 1688年)。書中所描繪的股票玩法已很複雜，虛虛實實，真真假假。根據出售期票和溢股的非常現代的規程，股票買空賣空。今天的經紀人若有興趣讀一讀這本書，便會心悅誠服地與之認同。去倫敦一游，在Chang Alley[交易所小路]的著名的咖啡館裡，人們可以看到一模一樣的狡詐和險技。

好了，我們不必再羅列下去了。我們捨繁就簡，把市場經濟冊分為二：低者是集市、店鋪和商販；高者是交易會和交易所。第一個問題：這些交換工具在哪些方面能夠幫助我們大致解釋

^① 阿雷蒂諾(Pietro Aretino 1492—1556)：意大利詩人、散文家、劇作家。因敢於用文字攻擊權貴而受到全歐洲的譴揚。人們說他是「抽打王公的鞭子。」

從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舊制度下的歐洲經濟之盛衰變遷？第二個問題：通過雷同與反差的對比，這些交換工具在那些方面能夠給我們闡明歐洲之外的經濟機制？對此，我們才開始略知一二。我現在來回答這兩個問題，作為本講的結束。

第四節

首先談一談在十五、十六、十七和十八這四個世紀西方的演進。

十五世紀，尤其在一四五〇年之後，經濟全面勃興，城市得利。農產品價格停步不前或者下降，城市在「工業」價格上升的推動下，先於農村啓動了。當時，驅動作用來自匠人的店鋪，或者說更多地來自城市市場。這一點是確切無誤的。這些市場依勢行令，予取予求。此次勃興因而帶着經濟生活「基層」的標記。

到了下一個世紀，由於其速度得到了恢復（在黑死病流行之前，十三和十四世紀曾是通暢加速的時期），由於大西洋經濟的擴展，當重新啓動的機器變得復雜起來的時候，馬達的轉動已升位至國際商品交易會：有安特衛普（Antwerp，比利時）交易會，貝亨（Bergen op Zoom，荷蘭）交易會，法蘭克福（Frankfort，德國）交易會，坎波城（Medina del Campo，西班牙）交易會，里昂（Lyons，法國）交易會。里昂曾一度是西方的中心。後來又添了以「貝桑松」（Besanson）^① 命名的交易會。從一五七九年至一六二一年的四十多年是熱那亞人（Genoese）——貨幣跨國流

① 貝桑松（Besanson）：法國西部城市，靠近瑞士。當年是軍事重鎮和商業中心。大文豪雨果的誕生地。

動的無可爭議的行家——處於支配地位的時期，由他們組織的貝桑松交易會運作十分精細周密，專司錢款與信貸交易。雷蒙·德羅韋爾(Raymond de Roover)生性謹慎，不大贊成對事物輕易進行歸納概括，他卻毫不猶豫地指出，大交易會的鼎盛之勢正是十六世紀的一大特點。這是個非常活躍的世紀，它的飛速發展，說到底，是由於經濟建築最頂層的勃勃生機，而且，源源而至的美洲貴金屬和驅動大量票據和信貸單快速流通的匯兌和反匯(*change et rechange*)系統更使這個層面的花木枝繁葉茂。在千般因由的同時作用下，熱那亞銀行家的這一嬌貴易碎的傑作坍塌於十六世紀二十年代。

十七世紀的經營活動，擺脫了地中海這個引力圈，拓展至大西洋的廣闊天地。人們常常將這個世紀描繪為經濟衰落或停滯時期。話似乎不應說得這麼絕對。因為，如果說，十六世紀的衝力在意大利等地已經不可否認地停頓下來，阿姆斯特丹倒也不是在經濟不景氣的大環境中神奇般地攀升起來的。無論如何，在下面這一點上，歷史學家的所見略同：總之，經營活動得以持續的支撑點是商品和基礎交換的決定性的回潮，這一切的得利者是荷蘭、它的船隊以及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與此同時，商品交易會讓位於證券交易所，讓位於商場。商場比之於交易會如同普通的店鋪比之於城市的逢三逢五的集市，換言之，連續不斷的供應代替了間斷的匯合。這是一段盡人皆知的、常規的歷史。不過，交易所並非唯一的成因。阿姆斯特丹的輝煌有可能遮住我們的視線，使我們忽略更為一般的成就。十七世紀，事實上，也是店鋪繁生之際，是商業川流不息的另一勝利。在歐洲，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店鋪遍地開花，建立了密集的銷售網絡。洛普·德維加(Lope de Vega, 1607)談及黃金世紀的馬德里時說：「在那裡，一切都變成了店鋪。」

在經濟發展全面加速的十八世紀，交易的一切工具都合乎邏輯地使用起來了：證券交易所擴展了它們的活動，倫敦模仿阿姆斯特丹並試圖取而代之，阿姆斯特丹此時取向專業化發展，欲成國際貸款之要地，日內瓦和熱那亞參與這些危險的遊戲，巴黎摩拳擦掌，開始亦步亦趨。這樣一來，錢款與信貸便越來越自如地從一處流到另一處。在此環境中，商品交易會自然淪為輸家：鑑於其天職在於通過施予財稅等優惠促進傳統的交易，在做買賣和籌措信貸都很方便的時期，交易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然而，情況不盡相同，在生機勃勃的地方，交易會開始式微，在傳統經濟仍躊躇不前的地方，交易會則得到發展與維持，因此，列舉出十八世紀的活躍的交易會，實際上是告訴你那裡是歐洲經濟的邊緣地區：法國的博蓋爾(Beaucaire)交易會地區，意大利的阿爾卑斯地區(博爾扎諾 Bolzano)或南部地區，還有巴爾幹(Balkans)、波蘭、俄羅斯，再往西，越過大西洋，便是新大陸了

在這個消費與交易增長期，城市的初級市場和店鋪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充滿活力，這是不言自明的。店鋪怎能不向鄉村蔓延？連流動商販也拚命活動，花樣翻新。最後，英國史籍稱為的「隱蔽市場」發展起來了。「隱蔽市場」是與「公開市場」相對而言的。公開市場受到嚴厲的市政當局監視，而隱蔽市場則逍遙法外。遠在十八世紀之前，隱蔽市場在全英國開始向生產者直接採購，經常是預購，例如，在市場之外向農民買羊毛、小麥、粗布等。這實際是違反傳統的市場規章而建立的一條自主的、極長的、行動自由的而且是肆無忌憚地利用這種自由的商業鏈。這些鏈條，借助於軍隊和大都會所需之巨量供應，以其高效爭得了自己的地位。吞食這些供應物的倫敦的「肚子」和巴黎的「肚子」最終竟起了革命性的作用。總之。十八世紀在歐

洲發展了一切，其中包括「反面市場。」

這一切都發生在歐洲。到現在為止，我們僅僅談論了歐洲。這倒不是因為我們從自然而然的以歐洲為中心的眼界出發想把一切都歸宗於歐洲獨特的生活，而是由於歷史學家這個行當在歐洲得以發展，歷史學家們都專心於自家的過去。近幾十年來，方向有了倒轉。在印度，在日本，在土耳其，資料源得到系統地開發，我們開始從旅行家的報告或歐洲歷史學家的著作之外的途徑了解這些國家的歷史。我們所了解的足以允許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以上所介紹的僅局限於歐洲範圍內的交換機件存在於歐洲之外的中國、印度、伊斯蘭國家和日本，那麼，我們能不能用來作一番比較性的分析呢？如果可能的話，這樣做的目的在於大致給非歐洲定下一個與歐洲相比而言的坐標，在於看一看二者在十九世紀不斷加深的鴻溝是否在產業革命之前已見端倪，看一看歐洲，當時是否比世界其他地區處於領先地位。

首先看到的是：到處都出現了市場，甚至在黑非洲剛剛成型的社會，甚至在美洲印地安人的各個文明地區。更不必說在那些非常充實的、發達的社會，這些社會密佈着初級市場。只要發揮一點想像力，當年的這些市場便如同是呈現在我們眼前一般，還是活生生的，或者說，是很容易恢復其原貌的。在伊斯蘭國家，城市差不多將農村的市場劫掠殆盡。正如在歐洲那樣，城市將農村市場吞滅了。這些市場中規模最大者在宏偉的城門前的非鄉非城的空地上鋪展開來，一邊是城裡人，一邊是農民，他們便匯合於此等中立地盤上。就是在城裡，市場竟也擠進了狹窄的街道和空地：顧客可以買到當天新鮮的面包，一些商品，還有——這一點與歐洲的習俗不同——許多菜肴和飯食：肉丸子、烤羊頭、炸糕、點心。大商業中心既是集市，亦

資本主義的動力

是店舖的集中地和歐洲式的中央菜場，阿拉伯人稱之為 *fon-douk*（豐都克），*bazar*（巴扎），在伊斯坦布爾則叫做 *Besestan*（室內市場）。

在印度，我們要注意到一個獨特之處：沒有一個村莊沒有市場，這是因為有一種客觀需要，即通過巴尼亞商人的介入將全村的實物佃租轉化為貨幣佃租，或者上交給「大莫卧兒」（Great Mogul）^①，或者上繳給他手下的王爺。這些鄉村市場構成了一片脈絡不清、中心不明的雲團，此中所見，是不是由於印度城市的把握力不足？還是應從另一面設想，巴尼亞^②商人開辟的是某種隱蔽市場，抓貨源一直抓到村子裡？

在初級市場的層面上，組織得最令人驚訝的肯定是中國了，其佈局幾乎達到了數學般地準確。先假設一個鎮子，或一座小城。請在一張白紙上劃一個點。點的周圍座落着六至十個村子，村與鎮的距離可使農民當天走個來回。這個幾何體——十個點圍着一個中心點——我們稱之為鄉，即一個鎮子市場的輻射區。在實際運作中，鎮上的市場形成了按街按片經營的局面，零售、放高利貸、代書人、小食品、茶館、酒館等都有各自的經營區。斯金納（G. William Skinner）說得對，中國的農村世界不是在村的模子裡，而是在鄉的模子裡鑄造出來的。同樣，你們很容易懂得，鎮子圍繞着城市運轉，與城市的距離適中，供應城市之需，並通過城市與遠處溝通，得到本地不出產的商品。這一切形成一個完整的系統，有個事實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即各鎮與中心城市的集市日期安排得互不重複。從一個集到另一個

① 莫卧兒（Mogul）：十六世紀早期至十八世紀中期統治印度大部分地區的穆斯林莫卧兒王朝。大莫卧兒即首領。

② 巴尼亞：印度的一個民族，善於經商，被稱為印度的猶太人。

第一章 對於物質生活和經濟生活的再思考

集，從一個鎮到另一個鎮，商販和匠人趕赴不息，因為，在中國，匠人的鋪子是流動的，你只能到集市上去找他們，也可以把他們叫到家裡幹活。總之，互相聯結的、皆受監督的定期集市所組成的網絡布滿了並活躍在中國大地。

店鋪和流動商販都數目繁多，生生不息。但是，缺少了高級機件——商品交易會和證券交易所。倒也有那麼幾個交易會，但都是邊緣性的，在蒙古附近或在廣州，給外國商人開的，這也是監督他們的一種方式。

箇中的因由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政府反對這些高層次的交易形式，或者初級市場的毛細血管式的流通對於中國經濟來說已經夠用的了，不再需要動脈與靜脈了。出於這一個或那一個原因，或二者兼而有之，中國之(商品)交換是一方無峰無丘、削平了的地盤。這就是中國資本主義未能發展起來的重大原因，這一點我們在另一講中還將論及。

在日本，交換的上層有着更好的構架，大商家的網絡組織得很完善。在南亞諸島，交換的上層也在着更好的構架。南亞諸島自古便是經商的十字路口，那裡有定期的商品交易會，有證券交易所。這裡所說的交易所，就像是在十五、十六世紀或更晚一點歐洲某地大商人每日聚會那樣的場合。譬如在爪哇島上的萬丹(Bantam)，^①每日集市結束時，批發商便在城市的某廣場碰頭。在很長的時期內，甚至在一六一九年巴達維亞(Batavia，雅加達舊稱)建城之後，萬丹一直是爪哇島上最活躍的城市。

印度是傑出的交易會之國，印度的交易會集交易與廟會於一身，往往在進香之地舉辦。整個印度半島被這些大廟會攬動

① 萬丹(Bantam)：爪哇蘇丹王國的舊城，現為廢墟。

資本主義的動力

得熱熱鬧鬧。它們無處不在，規模宏大，值得我們讚美。然而，它們不也是傳統經濟的特徵嗎？不也是某種面向過去的表現嗎？在伊斯蘭世界，交易會也有，但不像印度的那麼多，那麼大。麥加(Mecca)等幾個大交易場所是例外，特殊的例外正好證實了我們所得出的帶有普遍性的結論。穆斯林(Moslem)城市異常發達，異常有活力，擁有高級層面的交換機制和工具。可轉讓的票據與印度一樣流行，和現款一樣通用。信貸網把穆斯林城市與遠東連在一起。一七五九年，一位英國旅行者，從印度回國，途經巴士拉(Basra，現屬伊拉克)前往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土耳其)。他原來就沒打算把錢存留在蘇拉特(Surat，印度)的東印度公司，現在便將兩千皮阿斯特現金交付給巴士拉的一家錢莊，莊家用「混合語」(意大利、西班牙、法蘭西、希臘、阿拉伯、土耳其等國語言的混合，通用於地中海某些港口)給他開了一封致阿勒頗(Aleppo，敘利亞)一家錢莊的信件。理論上，這位旅行者可從中獲利，但他沒有得到企望的數目。任何人都做不到回回賺錢。

綜上所述，如果將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相比較，歐洲經濟更為發展的原因看來是在於其工具與建制的優勢，即擁有證券交易所和各種形式的信貸。不過，交換的機制和技巧，無一例外地存在於歐洲之外，在不同的程度上得到發展和利用。歐洲之外的地方，在這方面，有不同的等級：接近上層的有日本，南亞諸島和伊斯蘭國家可能也算得上，印度肯定也在這個水平上，因為它擁有巴尼亞商人發展起來的信貸網，製訂了向風險企業借款的政策，建立了海運保險業。處於下一層的是習慣於自給自足的中國。最後，在中國之下的則是仍處於原始水準的成千上萬的經濟區段了。

把世界各國經濟劃分等級並不是沒有意義的。在下一章，當

第一章 對於物質生活和經濟生活的再思考

我試圖評估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所佔據的地位時，我將引用此一級差。豎着排隊有助於分析取得成果。處於日常物質生活巨大實體之上的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布下了一張張羅網，維持着各類網絡的生機。在以本義而言的市場經濟之上的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慣常是在這個層面上繁榮起來的。可以說，在一張真正的立體地圖上，世界經濟呈現得清清楚楚。

第二章
交換縱橫談

在上一講中，我指明了從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一個巨大的自身消費領域所處的特有位置。從本質上說，這個領域與交換經濟完全沒有關連。直到十八世紀，甚至更晚，即使最發達的歐洲也有漏洞，這些漏洞就是很少參與整體生活的地區。它們與外界隔絕，固執地過自己的日子，幾乎完全處於封閉自守的狀態。

今天，我想談一談交換之本義，談一談我們給「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同時下的定義。使用這兩種叫法表明我們意欲將這兩個領域區別開來，在我們眼中二者不可混為一談。讓我們再重複一遍，(這兩類活動——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直至十八世紀仍是勢單力薄的，人類行動的主要部分被包含、淹沒在物資生活的廣大範疇中。如果說市場經濟在擴展，已經覆蓋了很廣闊的地盤，取得了可觀的成就，它卻常常缺乏厚度。我或對或錯地將歐洲舊制下的現實稱作「資本主義」，它屬於一個光輝的、精良的、但是狹窄的層次，它還攏不住經濟生活的全部，沒有創造出——例外正可證實規律——獨有的、自身趨於普及的「生產方式」。這個資本主義通常被人們叫做商業資本主義)它還遠遠未能抓住和左右整個市場經濟，儘管市場經濟是其不可或缺之先決條件。然而，話又說回來，資本主義在國內、國際、世界範圍內所扮演的角色已是很明顯的了。)

第一節

我在第一章中已經給你們談過的市場經濟呈現在我們面前，沒有太多含糊不清的地方。歷史學家們實際上賦予它一個顯赫的地位。大家對它皆優厚有加。相比之下，生產與消費則是勘察得仍然很不充分的大陸，對它的研究從數量而言僅屬起

資本主義的動力

步而已。了解生產與消費天地並非易事。相反，市場經濟是不斷被談論的對象。它連篇累牘地充斥着檔案資料——城市檔案、經商家族的私人檔案、司法與警務文書、商會的討論記錄、公證人的記載……如此這般，叫人怎能不注意它，不對它產生興趣？市場經濟始終佔據着舞台。

此中的危險，恰恰在於人們僅僅盯住市場經濟，用大量的細節描繪它，使人意會為其存在是蔓延性的，固守不縮的，而它只不過是一個巨大組合中的一個片段。這是由它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其本性只允許它在生產與消費之間扮演一個聯繫角色。這也是由下述的事實決定的：十九世紀之前，在支撐着它的日常生活的海洋和十回中有五回是自上而下地左右它的資本主義進程之間，它只是一個有些厚度與強度、有時卻很單薄的夾層。

對於市場經濟的這一局限性，感覺明快的歷史學家不多。正是這種局限性，通過對市場經濟進行的界定，給市場經濟下了定義，指明了它的真正作用。維托爾德·庫拉(Witold Kula)即是這少數幾個人中的一個。市場價格的變動，它的起伏，它的危機，其遙遠的關聯，其取齊的趨向，也就是說，一切使交易量規則的增長變為有形之物的原由都未能蒙騙住他們。庫拉有些形象的說法，其中之一是，始終應該注視井底，將視線穿透到水之深層，即穿透到「物質生活」的深層，市場價格可以觸及物質生活，卻鑽不進去，也不是每次都能帶動它。因此，一切不在兩面——即井口和井的深層——着筆的經濟史恐怕就是極其不完整的了。

這一點講明之後，我還要指出一個明顯的事實：從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市場經濟這個快速生活區不斷拓寬。拓寬的朕兆，證明拓寬的標記，這就是市場價格越過空間呈現出的連鎖

變化。在全世界，在對此已有許多觀察的歐洲，在日本，在中國，在印度，在伊斯蘭國家（也在土耳其帝國），在美洲，特別是美洲的那些貴金屬已發揮早期作用的地方，如新西班牙、巴西和秘魯，價格都在變動。這些價格呼應得或好或壞，起伏相隨的差距有大有小，在整個歐洲，由於不同國家的經濟相互鉤連着，價格差距微乎其微，但相反，拿十六世紀末和十七世紀初的印度來說，與歐洲相比，價格上至少有二十多年的差距。

總之，說好也行，說壞也行，某種經濟已將世界各地的市場聯繫起來了，這種經濟牽動的只是幾種特殊的商品，也牽動着已經周游世界的貴金屬。用美洲白銀鑄造的八字硬幣橫渡地中海，穿越土耳其帝國和波斯，到達了印度和中國。從一五七二年起，經過馬尼拉中繼站，美洲的白銀跨越了太平洋，通過這條新路，又一次抵達中國，完成了它的旅程。

這些實質性的聯繫、聯營網絡、買賣和運輸，怎能不吸引歷史學家的視線？在這些事物的景象面前，當時的人們為之驚愕，今天的歷史學家亦為之驚愕。甚至人類史上的第一批經濟學家所研究的不也正是市場的供與求嗎？目不轉睛的市政當局，它們奉行的經濟政策，不正是監視其市場，監視其市場的供應及市場的價格嗎？一國的君王，當他採取的行動形成了某種經濟政策的時候，該政策所涉及的不正是理應保護的國內市場和國籍旗幟嗎？所涉及的不正是與國內外市場緊緊相連的、理應推動的民族工業嗎？只有在市場這塊狹窄而敏感的區域內才有可能並順理成章地行動起來。正如實踐天天顯示的那樣，已經採取的措施在市場這個區域內都能得到反響。這終於使人們或對或錯地相信，交換起着決定性的、平衡的作用，使人們相信，交換通過競爭可以剷平水準差，調理供求關係，相信市場是一

資本主義的動力

尊看不見而甘盡義務的神明，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①稱之為的「無形的手」，相信十九世紀的自動調節的市場是經濟的拱頂石，如果奉行「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的話。

在這些論調中，有一份真理，有一份壞心，也有一份幻想。有多少次，市場被扭曲了！有多少次，價格被實際存在的或合法的壟斷集團專橫地確定了！這一點能夠忘記嗎？特別是，姑且承認市場（「市場是為人類服務的第一台電腦」）的競爭效能，但至少應該指明，在生產與消費之間，市場僅僅是個不完善的連接件，光是它的「局部性」就足以說明它是不完善的了。我們要強調的字眼是這個「局部性」（誠然，我信奉市場經濟的效能和重要性，但我不相信它能獨轄一切。）事實雖然如此，然而直至比較接近我們的時代，經濟學家仍只從市場經濟的模式和實踐推理。杜爾哥(Turgot)^②認為，流通就是經濟生活的整體。同樣，遠在杜爾哥之後的李嘉圖(David Ricardo)^③眼中的市場經濟只不過是一條很狹窄的、但很急湍的河流。誠然，五十餘年以來，在經驗的教益下，經濟學家們不再為放任主義的

① 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英國著名經濟學家。所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是第一部完整的政治經濟學大著作。他主張自由放任，反對政府干涉，認為自由競爭就會增加國民財富。

② 杜爾哥(Turgot, 1727—1781)：法國經濟學家，路易十六在位時曾任財政總監，試圖進行經濟大改革，取消了內部關卡，主張商業與工業自由，由於阻力巨大，終遭失敗。

③ 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在當時的經濟學界居於領導地位。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引起了他對經濟問題的興趣。其代表作為《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分析了社會中三個階級，即地主、工人和資本家在社會產品分配方面的規律。他使經濟學的研究系統化了，然而他把經濟學的範圍規定得比亞當·斯密狹窄的多。

自動效能辯護，但是，在當今的輿論和政治討論中，這方面的迷信仍然沒有消除殆盡。

第二節

在一段歷史時期內，資本主義並不總是被認可的。在關於此一時期的討論中，我竟然使用了「資本主義」這個字眼，之所以如此，首先因為我所需要的詞匯不是「市場經濟」，而是另一個字眼，用以指明一些顯然不同的活動。我的意圖決非引狼入室。歷史學家已反復使用過「資本主義」一詞，而且用得恰如其分，因此，當我也使用了它的時候，我心裡明白，這個戰鬥的字眼是曖昧的，可怕地載滿了現實意義，也很可能潛含着年代的顛倒。置一切慎重於不顧，我給「資本主義」這個詞打開了大門，箇中倒也有些因由。

首先，在十五至十八世紀這一時段，某些進程需要有一個特定的叫法。當人們細察這些進程的時候，人們就會覺得，將它們大而化之地列入普遍的市場經濟之中，實屬荒唐。在人們腦子裡自然跳出的字眼就是「資本主義」。你會覺得詞不達意，對它惱火至極，將它掃地出門，它卻幾乎立即越窗歸返。因為你找不到替代它的合適字眼，這種狀況是很凸顯的。正如美國一位經濟學家(Andrew Shonfield)所說的，「資本主義」這個字眼不論如何聲名狼藉，還得使用，最大的理由就是人們畢竟沒有找出替代它的詞匯。無疑，「資本主義」一詞是有弊病的，它總引起來不可勝數的爭吵和辯論。然而，這些爭吵，無論是好的、差一些的或是廢話連篇的，實際上都是無法避免的，也不可能不理這些爭吵而行事或討論問題。該詞最大的弊病在於，當今的現實生活賦予了它另外的意思。

資本主義的動力

「資本主義」一詞，從二十世紀初才開始廣泛使用。我也可能有點武斷，不過我認為，一九〇二年出版的威納爾·桑巴特(Werner Sombart)的名著《現代資本主義》(*Der moderne Kapitalismus*)是該詞正式出台之時。實際上，馬克思(Karl Marx)從未用過這個字眼。因此，作為歷史學家，我們可能直接犯下最大的過失：時序顛倒。有一次，一位年紀尚輕的歷史學家喊道，在產業革命之前，資本主義並不存在，「講資本嘛，有的。講資本主義，沒有！」

然而，在過去，甚至遙遠的過去，和當今之間，決不會有完全的斷裂、絕對的躍變，或者，如果喜歡的話，也可以說過去和當今之間決不會沒有沾染。往昔的所為不斷延伸到現時生活中來，也不斷擴充它。由此，許多歷史學家，且不是平庸之輩，今日都意認到，產業革命遠在十八世紀之前已初見端倪了。說服自己相信古今無斷裂的最佳論據或許就是今天一些不發達國家的景象。它們試圖進行產業革命，而且，眼皮底下就有成功的模式，但它們卻受挫了。總之，這個無休無止地被翻來覆去的辯證關係——過去，現在；現在，過去——恐怕正是歷史本身的核心，正是其存在的理由。

第三節

(「資本」和「資本家」是「資本主義」的支架並賦予其含義。若僅僅用於歷史探索，只有當你把「資本主義」一詞認真地用「資本」和「資本家」兩個詞套起來的時候，你才能界定其義。「資本」是可觸知的現實，是一整套容易鑒別的資源，處於無休止的運作中；「資本家」是籌劃或試圖籌劃將資本納入連續不斷的生產進程之人，對於此一進程，一切社會皆仰賴繫

之。「資本主義」，大體上(也只能是大體上)是通常很少出於利他目標的這種營營不息的納人活動的行事方式。)

在這裡，關鍵的字眼是資本。在經濟學家的研究中，「資本」的含義更被強調為「資產」。它不僅指積蓄的錢，還指先前一切勞動所取得的可資利用或已被利用的成果。一幢房子是資本，入倉的小麥是資本，一艘船、一條公路也是資本，但是，一項資產，只有當它參與再生產的進程時，才稱得上資本，金庫裡不使用的錢便不再是資本，同樣，不開發利用的森林也不是資本，以此類推。這一層意思就說到這裡，那麼，就我們所知，難道真有一個社會未曾積累過、也不去積累資產，不把資產有規律地用於勞動生產，並且不通過勞動重建資產，不使資產開花結果嗎？在十五世紀，西方最簡陋的村莊也有它的道路，也有清除了石塊的田野、種了莊稼的土地、籌劃安排的林子、磨房、存糧……歐洲舊制度下各國經濟的統計表明，一年勞動的毛值與資產總體(在法文中我們稱為 *patrimoine*)之間的比例為一比三或一比四，這也正是凱恩斯(Keynes)所認可的現代社會的經濟應有的比例。如此說來，每個社會都積累了三到四年的勞動成果，儲存在一邊，用以進行順利的生產，當然為此只是動用部份的積累，決不會動用百分之百的積累。

這些問題暫時講到這裡。你們對此和我一樣熟悉。好了，我現在該給你們解釋的只剩下一點了：我如何才能有根有據地將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區別開來？

當然，你們不會期待我作出下述這種毫不含混的區別：一層是水，另一層是浮在水面的油。經濟現實永遠不可能支撐在簡單的物體上。你們不難理解，至少有兩種形式的所謂市場經濟(甲與乙)，只要稍加注意，那怕只從它們建立的人際、經濟

資本主義的動力

和社會關係來看，這兩種形式即可識別。

(我把市場的每日交換、當地的或者近距離的貿易歸入第一種形式(甲)之中：譬如說，小麥和木材流向附近城市；我甚至把範圍更廣的貿易也歸入這種形式這中，只要這些貿易是定期的、可預見的、常規的、向大小商人放開的：譬如，在十七世紀，波羅的海地區的糧食從革但斯克(Danzig)賣到阿姆斯特丹；再譬如，歐洲從南到北的食油和葡萄酒貿易——我想到了每年到伊斯的利亞(Istria)地區(克羅地亞)採購白葡萄酒的德國大車隊。)

第一種形式的交換沒有出其不意的因素，是「透明的」，每個人都了解其來龍去脈，人們也大致承受得起其一貫有分寸的利潤。在這方面，一個鎮子的市場所提供的便是一個好的典型。它首先匯集的是生產者——農家男女、匠人等——和買主，其中一些人是本鎮的住戶，另一些是鄰村的居民。在買主與生產者之間，不時有中間商出現，最多也就是兩三個人。在有機會的時候，中間商通過囤積的手段攬亂市場，支配市場，左右價格。一個小轉賣商甚至可能違反規章而去鎮口迎堵農民，以低價收購他們的食物，然後高價出手：這是一種初級的欺騙行為，它在鄉鎮周圍，尤其在城市周圍普遍地存在着。當這種行為擴展時，便造成了物價的上漲。在一個我們想象的理想鄉鎮，其貿易是有條例的，是公正的、透明的——如同德國成語「眼對眼，手接手」所說的那樣，即使在這裡，逃避透明與監督的乙式交換也不可能絕對沒有。再如，販賣波羅的海地區小麥的大型車隊所做的貿易是一種透明的貿易：在始發點革但斯克的價格曲線和在終點阿姆斯特丹的價格曲線是同步的，商人的利潤既有保證，亦頗適度。但是，倘若地中海地區發生饑饉，如同一五九〇年出現的情況，我們就會看到代表大客戶的國際商人

讓海輪改變慣常的航線，所載之貨運至里窩那(Livorno)或熱那亞(Genoa)，價格必然增加二倍或三倍。在此情況下，甲式經濟便讓位於乙式經濟了。

只要在交換中升級，第二種形式的經濟便佔了主導地位，在我們的眼前便畫出了一個顯然不同的「流通範圍」。英國歷史學家指出，從十六世紀起，在傳統的公開市場——public market——身旁，他們稱之為的私下市場——private market——日漸擴大着影響。為了強調二者的不同，我特意把它叫做「反向市場」。說實在話，這個市場不正是尋求掙脫傳統市場的那些極為礙事的規則嗎？流動的商人，上門的收購人逕入生產者的家中。他們向農民直接購買羊毛、麻、活畜、皮革、大麥或小麥、家禽等。他們甚至預先訂購剪羊之前的羊毛、還在地裡長着的小麥。一張普通的條子，在村子裡的客棧裡，或者就在農家中，簽了字就等於訂了合同。然後，他們將收購的貨物用車輛、牲口或小船運至大城市或輸出的港口。這種情況在世界上比比皆是，巴黎四周如此，倫敦四周亦如此，塞哥維亞(Segovia)是羊毛集散地，那不勒斯(Naples)是小麥集散地，普利亞(Apulia)是食油集散地，南亞諸島(Insulinde)是胡椒集散地……流動商人不親赴農戶的時候，便與賣主在集市的外側約會，或者，最常見的情況是在一家客棧攬生意：客棧於是成了貨流的中繼點，運輸的驛站。這種類型的交換用個人之間的交易替代了集體市場的正常狀況，而個人交易的條件又隨着當事人各自的處境而任意變化。在英國，由於對賣主所簽具的條子有不同的解釋而引發的大量官司清清楚楚地證明了這一點。顯然這是些不平等的交換。在這些交換中，市場經濟的根本規律——競爭——大失其位；在這些交換中，商人佔了兩項優勢：其一，他斬斷了生產者和最終獲得商品者之間的關係(只有他了解

商業鏈兩頭的市場條件，因此，只有他對於可以指望的利潤心中有數）；其二，他有現款，這是他的主要理由。就這樣，在生產與消費之間便拉開了商業長鏈。這條長鏈的效率保證了它的存在。尤其在大城市的供應方面，由於它有效率，當局對它便聽之任之，至少對它放鬆控制。

然而，這些鏈條拉得越長便越能避開規則和慣常的控制，資本主義的進程也就越加清楚地凸顯出來。在遠程貿易——Fernhandel——中，它展現得很鮮明，並非只有德國的歷史學^①家從中看到了交換生活的頂點。Fernhandel 是個絕妙的自由操作的領域，它長距離運作，這使它不受通常的監視或者避開監視。在有需要的時候，它的行動可由科羅曼德爾海岸 (Coromandel Coast, 印度) 或孟加拉沿海直至阿姆斯特丹，由阿姆斯特丹直至波斯的、中國的或日本的某家銷售商店。在此廣闊的經營區內，它有選擇的可能，它選擇最能生利的買賣：安得列斯 (Antilles) 群島的貿易不是已經利微了嗎？這沒有甚麼了不起，就在同一時刻，在印度所做的區間貿易或對中國進行的貿易保證了雙倍的利潤。扛槍的人換換肩就行了。由於遠程貿易經手人只有幾個，從這些豐肥的利潤中便積累起巨額資本。並不是任何人想擠便能擠得進來的。相反，地方貿易分散於衆多的受款人之手。譬如，在十六世紀，葡萄牙的國內貿易，若論其總量和所料想的全部款額，遠遠超過胡椒、香料和毒品的貿易。但是，這種內貿經常採取以貨易貨的形式，表現為使用價值。香料貿易則直屬貨幣經濟。只有大批發商從事這種經營並在手中集中了超常的利潤。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笛福 (Daniel Defoe) 時代的英國。

① Fernhandel：德文字詞，意思是遠程貿易或長距離貿易。

在世界所有的國家，總有一夥大批發商從芸芸商人之中脫穎而出，一方面，這批人的範圍很狹小，另一方面，他們在從事其他活動的同時總是與遠程貿易聯繫在一起的，這決非偶然。在十六世紀之後的德國，在十三世紀之後的巴黎，在十二世紀之後、可能更早的意大利城市裡都可以看到這種現象。在西方出現第一批批發商之前，伊斯蘭國家就有了 tayir，即進出口商人。tayir 從他們的商號裡（已經實行坐商）指揮着經紀人和代理人的活動。tayir 和市場裡的 hawanti——小店主——不可相提並論。印度的阿格拉(Agra)，在一六四〇年的時候，還是一個大城市，一位旅行者記述道，在那裡被稱為 sogador 的人「正是我們在西班牙稱之為商人的人，但在他們之中，有些人則冠以 Katari 這種特殊的稱呼，它是這些國家中經營者的最高尚的稱號，其意為『極其富有、威望崇高的商人』」。在西方語言中的詞匯也標明了此類區別。「批發商」——Negociant——就是法國的 Katair；Negociant 一詞出現於十七世紀。在意大利，mercante a taglio(零售商)與 negoziант(批發商)之間差了十萬八千里。在英國亦然，零售商是 tradesman，批發商是 merchant，後者在英國的港口首先經營出口和遠程貿易。在德國，天壤之別存在於小作坊主(Kra mer)和大商人(Kaufmann 或 Kaufherr)。

不用說，在伊斯蘭國家也好，在基督教國家也好，這些資本家都是君王的朋友，是國家的同盟者或者是不擇手段利用國家的人。他們很早地、一貫地超越「本國」的界限，和外國商人串通一氣。他們千方百計為自己的私利搞鬼，通過操縱信貸，也通過在好錢和壞錢之間進行偷樑換柱的取巧把戲。金幣銀幣值錢，是好錢，用於大宗交易，流向資本；銅幣不值錢，是壞錢，用於發工資和日常支付，流向勞動。這些人有着信息、智

力和文化優勢。他們攫取周圍一切可取之物——土地、房產、定期租金……他們依仗着壟斷或者必要的權勢，十居其九能夠擊敗競爭對手。誰會懷疑這一點？一位荷蘭商人寫信給他在波爾多(Bordraux)的一個夥計，叮囑他保守他們計劃的機密，否則的話，「在這筆買賣上如同在其他許多買賣一樣，只要有別人出來競爭，那就無水可喝了！」最後，由於資本雄厚，資本家才得以維持其特權並包攬了當時的國際大生意。一方面，因為在那個運輸緩慢的時代，做大買賣，資金流動的周期必然很長：投入的金額需要數月、甚至數年才能連同利潤收回。另一方面，因為在一般情況下，大商人不僅僅動用他的資本：他還借助於信貸，即借助於別人的錢。總之，資本是流動的。佛羅倫薩(Florence)附近的普拉托(Prato)城中的商人弗朗切斯科·迪·馬爾科·達第尼(Francesco di Marco Datini)所遺留下的檔案向我們揭示，從十四世紀末開始，匯票已往來於意大利各城市和歐洲資本主義熱點之間：如巴塞羅那(Barcelona)、蒙彼利埃(Montpellier)、阿維尼翁(Avignon)、巴黎、倫敦、布魯日(Bruges)……他們的這一套玩藝就像今天巴塞爾(Basel)國際清算銀行的絕密會商一樣與平民百姓毫無干係。

商品世界或交換世界就這樣被嚴格地等級化了，從最卑微的職業——腳夫、裝卸工、小商販、運輸者、水手，到出納員、店主、各種經紀人、高利貸者，直至批發商。一眼看上便使人驚異之事，就是專業化，即勞動分工。勞動分工隨着市場經濟的進展，迅速增強，波及整個商業社會，但處於頂層的批發商——資本家卻是例外。職能分解的進程是一種現代化，它首先並且僅僅表現在下層：各種手藝人、店主，甚至商販都專業化了。但金字塔的頂尖卻並非如此，直至十九世紀，實力雄厚的

商人可以說從不局限於某一種經營活動。當然，他是商人，但從不只幹一種行當，他隨機應變，一會兒是船主、承保人、貸款者，一會兒又是借款人、金融家、銀行家，甚至是實業家或農業經營者。在巴塞羅那，十八世紀的時候，零售商店總是專業化的：出售的或是粗布，或是呢絨，或是香料……財發大了，有朝一日變成了批發商，他就立即從專業化走向非專業化。從此之後，一切力所能及的好生意他都做。

此種越規行爲經常被注意到，但通常的解釋卻不能令我們滿足：人們對我們說，商人在不同的方面進行分散經營，爲的是減輕風險：做紅染料賠了，靠香料賺；錯過了一樁生意，那就靠換匯或向某農民借錢收息贏利……總之，他遵從一則法國成語的忠告，即「不要把全部鷄蛋裝在一隻籃子裡」。

對此，我認爲：

——商人不實行專業化，其原因在於，在他所能觸及的範圍內，沒有任何一個行當有足夠的油水可以將其全部的活動攬固。人們往往以爲，往昔的資本主義由於缺少資金而財單力薄，花了很長的時間進行積累才得以枝繁葉茂。然而，商務函件或商會的備查文書在相當多的情況下顯示，一些資金找不到投入的場所。資本家於是有了興趣置地，土地是保值之物，擁有土地在社會上亦頗光彩，資本家有時也有興趣購置收益頗豐的、以現代方式進行經營的土地，在英國，在威尼斯或其他地方都是如此。資本家或者受誘在城市倒賣房產。還可能謹慎而再三地涉足工業領地，如進行礦產投機(十五—十七世紀)。但是，意味深長的是，除了個別例外，商人對於生產體系不願入股，而是滿足於使用把活計外派到承攬人家中去做的辦法，即 putting out 的辦法，來控制手工生產，以便保證更好地銷售。與工匠和 putting out (putting-out) 系統相比，工場直至十九世紀只不過

是生產領域中的一個很小的部份。

——大商人經常更換經營活動，這是因為高利潤不斷地從一個部門向另外一個部門轉移。資本主義的實質就是隨行情而變。現今也還是如此，資本主義的巨大能力之一是它很容易適應形勢與進行轉產。

——大商人的經營活動只有一種有時具有專業化的傾向，那就是金錢交易。但是，它的成功從未為時長久，好像是經濟大廈沒有足夠的力量支撐這個經濟尖端一樣。佛羅倫薩銀行，曾輝煌一時，但在十四世紀便敗落在巴爾迪(Bardi)家族和佩魯齊(Peruzzi)家族手裡，到了十五世紀又改落在梅迪契(Medicis)家族手裡。從一五七九年起，熱那亞興辦的普萊桑斯(Piacenza)金融交易會變成了幾乎全歐洲的匯劃結算所，但是，熱那亞銀行家非凡的作為持續了不到半個世紀，至一六一二年便銷聲匿迹了。在十七世紀，阿姆斯特丹獨佔了歐洲信貸流通的鰲頭，但這一番經歷到了下一個世紀以失敗而告終。只是到了十九世紀，在一八三〇——一八六〇年之後，金融資本主義才取得了成功，因為這個時候，銀行已掌握了一切，既控制了工業，也控制了商品，而且，從總體來說，經濟已經發展得相當茁壯，最終撐得起金融建築了。

(我現在總結如下：有兩種類型的交換，一種是普通的、競爭性的、幾乎是透明的；另一種是高級的、複雜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兩類活動的機理不同，約束的因素也不同，資本主義的領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類活動，而是第二類活動。)我並不否定可能有一種既狡滑又殘酷的明火執仗的鄉村資本主義。莫斯科的達林(Viktor Dalin)教授對我說，列寧甚至認為，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若一旦將自由歸還給鄉村市場，它便能夠發育出資本主義的整棵大樹。我也不否認存在着由店主們實行的某種

微型資本主義。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認為，真正的資本主義脫胎於此，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力量對比可能成形並且存在於社會生活的一切層次。但是，歸根結底，初始的資本主義鋪展、顯示力量、呈現於我們面前的地方是社會的上層。只有在巴爾迪、雅克·科爾(Jacques Coeurs)、雅各布·富格爾(Jakob Fuggers)、約翰·勞(John Laws)或者奈克爾(Neckers)等家族的高度上方可探索並或許能了解到甚麼是資本主義。

通常，人們對於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不加區別，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二者從中世紀至今總是同步發展的，是因為人們經常將資本主義說成是經濟進步的驅動力和經濟進步的充分的展現。其實，一切都馱在物質生活的巨大脊背上。物質生活充盈了，一切也就前進了，市場經濟也就藉此迅速地充盈起來，擴展其關係網。資本主義一貫是這種擴充的受益者。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把企業家奉為天降的神明，我不認為他說得有理。我固執地相信，整體運動才是決定性的，一切資本的輕重大小首先取決於支撑它的下層經濟。

第四節

資本主義是一小部份人的特權，然而，沒有社會的積極脅從，其存在是不可想像的。它必然是社會秩序的一種現實，甚至是政治秩序的一種現實，甚至是一種文化現實。因為，要做到這一點，全社會必須以某種方式，帶着或多或少的清醒意識接受資本主義的價值。當然，情況並非一貫如此。

一切密集的社會都可被分解為幾個「組合」：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級制度。只有與其他「組合」聯繫起來，滲透到其他「組合」之中並且也向其他「組合」敞開大門的情況下，

資本主義的動力

經濟這一塊才能被理解。這些「組合」既有單獨的行動，也有相互的作用。資本主義是經濟「組合」中的一種特殊的和部份的形式。上述的「組合」相互為鄰而又相互滲浸，只有以此為據，資本主義方可得到充分的解釋。

所以說，現代國家並沒有造就資本主義，而是繼承了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時好時壞。時而允其擴展，時而斷其生機。當資本主義與國家趨同，當它即是國家之時，便是它得勝之日。在資本主義第一個大發展階段，在意大利的城邦中，如威尼斯、熱那亞、佛羅倫薩，掌握政權的正是財主中的佼佼者。在十七世紀的荷蘭，攝政貴族為了生意人、批發商和出資者的利益，甚至根據這些人的指示來統治國家。在英國，一六八八年的革命標誌着工商界的登基，如同荷蘭一樣。法國則晚了一個多世紀，經過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工商資產階級才穩穩當當地主了政。

國家根據自身的均衡狀況和自身的抵制能力對於金錢世界採取支持或反對的態度。文化與宗教的情況亦然。從原則出發，作為傳統力量的宗教對於市場、金錢的使用、投機、高利貸等方面出現的新事物總是說不。但是，教會對此卻有些順應。教會口頭上也是不斷地說不，到後來對於世事迫切的需求終於說了行。簡言之，教會採納了 *aggiornamento*(意大利文，意為人時)，*aggiormento* 是個較新的用法，當時的說法是 *modernisme* (*modernism*，現代主義)。奧古斯丹·勒諾代(Augustin Renaudet)回顧說，聖·托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確立了第一個應運成功的現代主義。不過，如果宗教，或曰實質上的文化，相當快地撤除了障礙，它卻堅持了強烈的原則上的反對，尤其對於有息貸款，將之譴責為高利貸。有人甚至過於匆忙地認定，若沒有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這些顧忌是消除不了的，還認定，這正是北歐國家臻至資本主義的深

刻原因。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認為，從字眼的現代意義上來講，資本主義不多不少就是新教(Protestantism)的產物，或更恰當地說，就是清教主義的產物。

所有的歷史學家都反對這種難以捉摸的論點，儘管他們做不到將其徹底揚棄。此一論點不斷在他們面前再現。然而，該論點顯然是錯誤的。北歐國家只不過取代了地中海老的資本主義中心長期而出色地佔據過的位子。它們無論在技術上還是在工商業的操作上，都沒有任何創新。阿姆斯特丹仿效威尼斯，正如此後倫敦仿效阿姆斯特丹，紐約仿效倫敦一樣。此事的關鍵每次都是世界經濟重心的轉移，轉移的原因是經濟因素，並不涉及資本主義固有的或秘密的性質。在十六世紀的最末期，由地中海向北海的最終轉移正是一個新興國家對衰老國家的勝利。此外，其規模亦今非昔比了。隨着大西洋的興起，全面的經濟、各種交換、貨幣的儲存都擴大了，這也是市場經濟充滿活力的進展。市場經濟忠於阿姆斯特丹的約會，此後便背負起資本主義更大規模的建樹。最後，依我之見，馬克斯·韋伯的錯誤主要在於一開始便誇大了資本主義的作用，將其視為現代世界的創導者。

但是，實質問題並不在此。實際上，資本主義的真正命運是在同社會各種等級制度的較量中決定的。

一切發達的社會都允許幾種等級存在，我們也可以把它稱之為幾個階梯，這些階梯可供人們從樓底向上攀登。住在樓底、在貧寒中生息的是基層的大眾，即納爾·桑巴特所說的 Grundvolk。等級分為宗教的、政治的、軍事的、各種錢財的。根據時代和地域的不同，在等級之間，有敵對，有妥協，有同盟。有時甚至混亂不清。在羅馬，十三世紀的時候，政治等級和宗教等級匯為一體，但是，在城市周圍，土地和畜群造就了一個危

險的大領主階級，而與此同時，教廷的銀行家——即錫耶納(Sienese)人——也爬到了很高的地位。在佛羅倫薩，十四世紀末，過去的封建貴族與新起的商業大資產階級已經合二為一，組成了英氣勃發的錢財集團，理所當然地也攫取了政權。相反，在另外的社會環境中，政治等級制度能夠壓倒其他的等級制度：中國的明朝與清朝便是如此。歐洲舊制度下的法國君主政體亦如此，只是不像中國那樣明顯與一貫而已。在很長的時期內，法國的君主政體只準商人、那怕是富有的商人扮演一種無威望的角色，而將貴族的決定性的等級制度推至一線。在路易十三統治下的法國，通往權勢的道路是接近國王和宮廷。窮酸的呂宋(Luson)教區的主教黎世留(Richelieu)的真正生涯的第一步是當上了皇太后瑪麗·德·美第奇(Queen Mother Marie de Médicis)的指導神甫，由此便直入宮廷並擠進了掌權者的小圈子。

有多少社會便有多少實現個人野心之路。也就有多少成功的典型。在西方，儘管孤立的個人成功並不少見，歷史卻頻頻不休地重複同樣的課程，即個人的成功幾乎總應記在某些大家庭的賬上，這些家庭警覺審慎、專心認真，拚了老命也要一點一滴地增加自己的財富和影響。他們的抱負與耐心配合，長期鋪展。如此說來，是不是應該讚頌一下那些「繼世長」的家族，讚頌一下名門的榮光和功德呢？我之所以講這些，為的是突出我們從總體上稱之為的西方「資產階級」的歷史。我們使用的「資產階級」這個詞是「很晚」才被人們所接受的。資產階級是資本主義進程的推動者，是日後成為資本主義的牢固的等級制度的創造者和利用者。在實際中，為了確立其財富和勢力，資本家們輪番或同時依靠商業、高利貸、遠程貿易、官府和土地。土地的價值是可靠的，此外，超出人們的想像，土地為其擁有

者在社會上建立一種顯耀的威望。如果你們注意研究一下這些淵源流長的家繫，注意一下慢慢積累起來的家產和榮譽，你們就差不多懂得了歐洲是如何從封建制度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封建制度是領主家族分享基礎財富——土地財富——的一種持久的形式，即一種在其結構中的穩定的秩序。「資產階級」，延綿幾個世紀，寄生於這個特權階級，貼近它而又反對它，利用它的錯誤、奢侈、游手好閒、缺乏預見，經常用高利貸的辦法，奪取了它的財產，最終鑽進它的行列，然後融合其中。一批資產者這樣幹了，另一批再接再勵，發起衝鋒，重新投入同樣的鬥爭。總之，寄生是長期的：資產階級為了養肥自己而摧毀統治階級，在這方面他們決不會罷手的。但是，資產階級的上升是緩慢的，具有耐心的，其抱負的實現由於子孫相繼努力，子孫傳於孫，孫又傳子，無休無止。

此類社會，從封建社會派生出來，自身還處於一種半封建狀態，它是一種這樣的社會：財產、社會特權都相對地受到庇護，由於財產是、至少想讓它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大家族在一種相對的安定中尚可享受財產與特權，每個人大體上各歸其位。財富得以積累，家系得以成長與維持。在貨幣經濟的幫助下，資本主義最終得以浮現，所需要的正是這種平靜的或相對平靜的社會之水。這樣做，資本主義摧毀了上層社會的某些堡壘，當然是為了修築有利於自身的、同樣堅固的與持久的新保壘。

家財孕育經千日，光彩成就一朝至，在過去和現在，這種現象對我們來說是太熟悉了，以至於我們難於意識到這實際上是西方社會的一大特點。只有當我們置身境外，放眼歐洲之外的社會所展現的不同景象之時，我們才能真正看清此點。在歐洲之外的這些社會裡，我們稱之為，或可以稱之為的「資本主義」總要遇到很難或者不可逾越的障礙。通過對比，這些障礙

成了我們進行全面解釋的引子。

我們且把日本社會放在一旁。其發展進程與歐洲大體一至：封建社會日漸損蝕，資本主義社會最終脫胎而出。再者，日本乃商業豪門傳世最久之邦：其中一些形成於十七世紀，至今仍興旺發達。但是，西方社會和日本社會是比較社會史上幾乎自動由封建秩序轉入金錢秩序的唯一例子。在其他地方，國家、身份特權和金錢特權的地位殊異，我們正是從這些不同之處謀求教益的。

書歸正傳，且談中國與伊斯蘭國家。在中國，向我們提供的不完善的統計留下的印象是自上而下的社會機動性較歐洲更大。這倒不是因為擁有特權的人數相對更多，而是社會的構成遠不如歐洲穩定。科舉是敞開的大門，開放的等級。雖然這些考試並不總是在絕對公正的環境中進行，但社會各界皆可應試，比十九世紀進西方名牌大學不知方便了多少倍。科舉打開了通往高官厚祿之路，實際上是社會遊戲的重新分牌，是恒定的New Deal(新政，新的分配局面)。晉升至頂峰的官位從來都是暫時的，弄得好，最多也不過是終生受用。他們在任時所斂之財很少能夠奠定一個在歐洲稱得上的大家族。再說，過份富有，勢力過大的家族定將受到國家的懷疑。在法律上，國家是土地的唯一擁有者，只有國家有權向農民徵稅，對於礦、工、商企業看得很緊。儘管商人與腐敗的官吏在地方上共謀，中國的國家政權從來都毫不懈怠地反對資本主義的自由伸展。每當資本主義在有利的條件下成長之時，它最終被可以稱為極權(totalitarian，該詞並非當今理解的貶意)的國家所制服。中國的真正資本主義處於中國之外，譬如說在東南亞諸島。在那裡，中國商人可以完全自由地行事與作主。

在廣闊的伊斯蘭國家，尤其在十八世紀之前，土地的擁有

是臨時的，因為土地在這些國家同樣屬於君王。歷史學家使用舊制下的歐洲語言說，在這些國家裡，好處（即終生得到的利益）是有的，家族采邑是没有的。換言之，領主權，即土地、鄉村、地租，是由國家分配的，如同加洛林王朝過去之所為，受益者一死，領主權重新由國家支配。就君王而言，這是一種酬賞士兵和騎士、保證他們效力的方式。領主一死，其采邑和一切財產便重歸伊斯坦布爾蘇丹（Sultan of Istanbul）或德里的大莫卧兒（Great Mogul of Delhi）。可以說，只要權在手，這些大君王便能夠像換襯衣一樣地更換統治圈子和精英階級，這個權，他們不可能不用。社會的頂峰因此經常更新，大家族不可能牢嵌不動。最近有一份研究十八世紀開羅的材料告訴我們，大商人無法維繫一代以上。政治社會將他們吞噬殆盡。在印度，商業生活比較穩固，那是因為商業生活的發展處於上層變化無常的圈子之外，處於商人和銀行家階級的護欄之內。

講了這些之後，你們能夠更好地理解我所闡述的相當簡單的、也許正確的論點：資本主義的推進與成功需要有一定的社會條件。它要求社會秩序有某種安定，要求國家政權的某種中立，或某種寬容，或某種殷勤。就在西方本身，這種殷勤討好的程度便有差異：由於廣泛的社會原因和歷史的原因，譬如與英國相比，法國一直是一個更不贊同資本主義的國家。

我想，這個觀點不至引起嚴重的異議。相反，一個新問題自動提出來了。資本主義需要有一種等級。但是，在一個審視過成百上千個等級社會的歷史學家的眼中，等級制度本身倒底是個甚麼東西？在這些社會的頂峰都形成了一小撮特權者和負責人。這便是昨天的現實：在十三世紀的威尼斯如此，在舊制度（Ancien Régime）之下的歐洲如此，在梯也爾（Thiers）先生的法國也是如此。在一九三六年的法國，人民群衆提出口號，譴

資本主義的動力

責「二百家族」的權力。在日本，在中國，在土耳其，在印度，情況亦然。這仍是今日的現實。甚至在美國，資本主義並沒有創造各種等級制度，它只是利用這些等級而已，正如它並未創造市場或消費一樣。從長遠的歷史觀點來看，資本主義是一個晚間來客。當他到達的時候，一切早已安排就緒。換句話說，等級這個問題的本身已將資本主義超越，事先就支配了它。非資本主義社會可惜也未能革除等級制度。

這一切引發着漫長的討論。在我的書中，我試圖對此介紹，不求結論。因為，這肯定是個關鍵問題，是問題中的問題。要不要打碎等級制度？要不要消除人對人的依附？一九六八年，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說要打碎，要消除。然而，這真的能做到嗎？

第三章

世界 的 時 序

在以上兩章中，我向你們介紹了拼板遊戲的構件，或單獨地介紹，或成組地介紹，其順序是出於解釋的需要隨意而定的。現在可以進行整體拼接了。這正是我的著作第三卷、也是最後一卷的目標。該卷的題目是：世界的時序。標題本身已亮出我的意圖：將資本主義、它的進程以及它的資財與手段和世界總體歷史聯繫在一起。

一段歷史，就是按照年代的順序所出現的一件又一件成形之物，一樁又一樁的經歷。所謂總體，指的是一個統一體，它在十五至十八世紀之間浮現並逐漸地令人們感受到它對於人類整個生活、對於世界上一切社會、一切經濟和一切文明所產生的影響。而這樣一個世界是在不平等的徵兆之下自我肯定下來的。萬變不離其宗，今日之景象——一邊是富國，另一邊是不發達國家——在十五世紀和十八世紀之間已經切實存在着。誠然，從雅克·科爾到讓·博丹(Jean Bodin)，到亞當·斯密和凱恩斯，富國與窮國並非一成不變。歷史的車輪向前滾動了。但是，在其規律之中，世界並沒有變：在結構上，它繼續分化為富貴與貧賤。世界是一個大社會，它和一個普通的社會一樣等級化了，它是一個普通社會放大了的、但頗易識別的形象。微觀世界與宏觀世界，歸根到底，乃同一結構。為甚麼呢？這正是我試圖解釋的，但不一定能講得清楚。在事物的「如何」和「為甚麼」之間，歷史學家更容易看「如何」，確切一點說，在大問題的「因」與「果」之間，更容易看「果」。當然，惟其如此，歷史學家才更執著於發現事物之「因」，而常常卻又抓不到它，並且受它的嘲弄。

第一節

我們需要再一次為詞匯明確定義。我們要使用的是兩個詞組：世界經濟和經濟世界，後者較前者更為重要。世界經濟意為整個世界的經濟，也就是西斯蒙第(Sismondi)所說的「全球市場」。經濟世界(*économie — monde*)是我根據德文單詞Weltwirtschaft創造出來的，我指的是在全球形成一個經濟整體的情況下，地球上一個部份的經濟。很久以前，我曾寫道，單單是十六世紀的地中海便是一個經濟世界。在德語中，人們也可以說：eine Welt für sich，即一個自在的世界。

一個經濟世界可以被確定為三重意義的現實：

——它佔據着一個特定的地理空間。因此，它具有使之成為這一空間的界限，它的幅員是變化着的，儘管以某種緩慢的速度變化。不時地，但在長期的間隔中，必然會有斷裂。十五世紀末科學大發現之後情況就是這樣的。一六八九年的情況也是這樣的，那時，由於彼得大帝(Peter He Grrent)的德政，俄國向歐洲經濟實行了開放。今天，我們可以假設中國和蘇聯實行一種不折不扣的、全面的、最終的開放，那麼，當前存在的西方空間的邊界將會出現斷裂。

> ——一個經濟世界總要有一個極，一個中心，其代表為一座有支配地位的城市，過去是一個城邦，今天是一個首都，這個首都可以理解為經濟首都(在美國是紐約，而不是華盛頓)。此外，在同一個經濟世界裡，可能長期同時存在兩個中心：在奧古斯特(Caesar Augustus)、安東尼(Anthony)和克婁巴特拉(Cleopatra)時代，有意大利的羅馬和埃及的亞歷山大；在基奧賈戰爭時代(Chioggia, 1378—1381)，有威尼斯和熱那亞；在

資本主義的動力

十八世紀，荷蘭最終被淘汰之前，有倫敦和阿姆斯特丹。一九二九年，世界的中心，雖然遲疑了一下，卻毫不含糊地從倫敦轉到了紐約。

——每個經濟世界都分解為延續的區域。心臟，即圍繞着中心的地區：當阿姆斯特丹統治世界的時候，中心地區是聯合省（但不是聯合省的全部）；當倫敦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之後取代了阿姆斯特丹的時候，中心地區是英國（但不是英國全部）。下一個層次便是中軸周圍的中間地區。最後是廣袤的邊緣地區。在作為經濟世界特徵的分工中，邊緣地區不太能主動參與，而是處於從屬的、依附的地位。在這些周邊地區，人們的生活常常使人想到煉獄，甚至地獄。它們的地理處境已足以成為這種狀況的因由。

這些匆促表述的看法自然需要解釋與論證。我著述的第三卷就包含着必要的解釋與論證，但是，在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著作《現代世界體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中你們也可以得到一個準確的估計。他的這本書一九七四年在美國發行，法文版的題目是《從十五世紀至今的世界體系》（弗拉馬里翁出版社）。在這一點或那一點上，甚至在一兩條主線上，我與他的意見並不吻合，但這無關緊要，在問題的實質上，我們的觀點是一致的。雖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認為，在從十六世紀才建立起來的歐洲經濟世界之外，不存在其他的經濟世界，而我卻認為，遠在歐洲人認識整個世界之前，自中世紀，甚至自古代起，世界已經分成一些在不同程度上集中和結構緊密的經濟區，也就是說，有好幾個經濟世界共存。

這些共存的經濟體之間所進行的交易是極其有限的，它們分別佔據着地球上的居住空間，而居住空間由相當寬闊的邊界地域連接，除了幾個例外，橫跨如此寬闊的地域做買賣在一般

情況下獲利不大。在彼得大帝之前，俄羅斯本身就是經濟世界當中的一個，自食其力，也自我封閉。在十八世紀末期之前，巨大的土耳其帝國也是一個經濟世界。相反，查理五世帝國或菲力浦二世(Philip II)帝國，雖然幅員廣闊，卻不是一個經濟世界：從其誕生之日起，它便被納入了由歐洲織成的古老而活躍的經濟巨網。在一四九二年之前，哥倫布(Columbus)尚未遠行，歐洲加上地中海，帶着伸向遠東的觸角，也是一個經濟世界，其標誌便是威尼斯的輝煌。這個經濟世界在科學大發現之後擴大了，兼併了大西洋及其島嶼與沿岸，然後慢慢地併吞了美洲大陸腹地。它密切了與其他的當時仍然自主的經濟世界——印度、南亞諸島和中國的聯繫。同時，在歐洲本身，其重心由南向北轉移，轉到安特衛普(Antwerp)，爾後又轉至阿姆斯特丹。請注意，它並沒有轉向西班牙帝國或葡萄牙帝國的中心，即塞維利亞(Seville)或里斯本(Lisbon)。

這樣，我們可以在世界地圖和世界演進的歷史上放一張透明的描圖紙，用鉛筆把每一個時代的各個經濟世界粗略地劃下來。對比之下，我們會看到，這些經濟體的變化很慢，我們因此就有充裕的時間研究它們，看它們是如何生存的，掂掂它們的份量。變形甚為緩慢的經濟體向我們展示的是一部根深蒂固的世界歷史。這部深固的歷史，我們只能簡單提一提，因為我們在此研究的問題僅僅想說明，歐洲由於其發展而建成的一個經濟世界在哪些方面能夠解釋或者不能解釋資本主義的機制和資本主義自身的發展。我想在此先說一句話：這些經濟世界當年正是歐洲的、然後是世界的資本主義的模子。接下來，我姑妄相當審慎地，也相當徐緩地對此予以解釋。

第二節

一部深固的歷史。我們不是來發現它的，我們是來強調它的。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倘若在世，他會說：「我們給它以尊敬。」這已是很了不起的事了。在我依次着重闡述各經濟世界的中心變換，即中心偏移，着重闡述每個經濟世界都劃分為同心區域之後，你們將會相信這一點。

每當出現一個中心失落的情況時，一個新中心的重組過程就開始了。看來，一個經濟世界若沒有一個重心、若沒有一個極，便不能生存下去。但是，老中心的失落和新中心的形成並不是經常發生的，因此，其關係也就更為重大。就歐洲以及它兼併的地區而言，在十四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一個中心在威尼斯形成了。接近一五〇〇年，風雨突然大變，中心從威尼斯乘風降至安特衛普(Antwerp)，接着，在一五五〇——五六〇年之際，風頭又回歸地中海，不過，這一次熱那亞迎得了風氣之先。後來，風向轉移到了阿姆斯特丹，歐洲區的經濟中心在那裡穩定了近兩個世紀。在一七八〇至一八一五年間，中心移位於倫敦。一九二九年，中心橫越了大西洋，定位於紐約。

歐洲世界的大鐘如此這般地曾五次敲響決定命運的時刻。每一次，中心的移位都是在鬥爭、對抗、劇烈的經濟危機中實現的。通常，最終打垮已經受到威脅的舊中心並且確認新中心出現的，正是惡劣的經濟氣候。當然，這一切並不具有數學式的規則性：一場持續的危機即是一次考驗，強者可以經受過去，弱者便倒下去了。因此，一個中心並非一受打擊便摧枯拉朽。相反，十七世紀的危機常常使阿姆斯特丹化險為夷，反得其利。今天，我們正經歷着一場歷時數年的、表現強烈而持久的世界性

危機。如果紐約在考驗中垮了——我對此全然不信——世界必定尋求或創造出一個新的中心；若是美國頂得住，如同一切令人預見的那樣，美國則可能在經受考驗後更為強大。因為其他國家的經濟在我們當前所處的不利環境之中恐怕比美國受到的折磨更多。

總而言之，中心的形成、失落、再形成通常是與總體經濟的歷久危機聯繫在一起的。因此，研究總體歷史回潮的全部機制，無疑要從研究危機入手。這是一項難度頗大的研究。就近看一個例子可使我們免費許多口舌。由於一些災難，一些政治事故，也由於安特衛普這個世界中心未獲鞏固，在十六世紀的後半期，整個地中海便東山再起了。此前，來自美洲礦區的大量白銀穿過大西洋首先經西班牙運至比利時的佛蘭德地區，但從一五六八年起，卻改道途經地中海了。熱那亞於是變成了集散中心。從直布羅陀海峽到東部沿岸，地中海又迎來了某種經濟復興。人們當時稱之為的「熱那亞世紀」(century of the Genoese)好景不長。形勢日漸式微，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內曾經作為歐洲生意結賬中心的熱那亞金融交易會在一六二一年之前已失去了它的重要作用。地中海又變為一個次要的地域，在科學大發現之後，這種變化倒也相當人情人理，在此後很長時期內，地中海一直是一個次要地域。

在哥倫布之後一個世紀，即在歷經一次令人吃驚的大松懈之後，地中海衰落了，這是很久之前我寫的一本關於地中海區域的書中所提出的關鍵問題之一。地中海的潮落應定在何時？一六一〇，一六二〇，一六五〇？尤其值得了解的是，何謂成因的進程？這後一個問題最為重要，我認為，理查德·T·拉普(Richard T. Rapp)在一篇文章中〔1975年，《經濟史雜誌》(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75)〕作出了出色而準確的解

答。我願意說，這是許久以來我所讀到的最漂亮的文章之一。我們得到證實，從十六世紀七十年代起，地中海世界就遭到了北歐船舶和商人的騷擾、擠撞和掠奪，而且這些人並不是通過印度公司或者在五洲四海的冒險而積聚了他們的第一批財富的。他們涌向了地中海現成的財富，通過各種辦法，最好的和最壞的辦法，將地中海的財富據為己有。他們向地中海地區投放了大量的廉價產品，往往是些劣貨，但明知故犯地模仿南歐的優質紡織品，甚至打上世界有名的威尼斯印記，以便用這種標簽為幌子在威尼斯的普通市場出售偽劣產品。這樣一來，地中海的工業便同時失去了顧主和聲譽。如果在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的時間裡，一些新興國家得以定期搜刮美國國外的、甚至國內的市場，使用 Made in USA(美國製造)的標簽出售自己產品，請你們想一想，這將會出現甚麼情況。

總之，北歐人的得手看來不是由於更好的生意經，也不是由於工業競爭的自然規則(也不是由於他們着手進行的改革，儘管他們確因工資低廉而佔據了優勢)。他們對於老的得利者的政策無他，就是取而代之，為此而使用強暴行為乃是其中應有之義。這條法則現今依然如故，難道還用再說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列寧所譴責的使用暴力瓜分世界，並不像他所相信的那樣新鮮。這不還是當今世界的現實嗎？誰處於中心或靠近中心的地方，誰就可以對他人行使一切權力。

這一點提出了已經提及的第二個問題：每一個經濟世界總是分成幾個同心地區，這些地區離趾高氣揚的中心極越遠越不利。

光彩，財富，生活之幸福皆匯集於經濟世界的中心，在那裡，歷史的太陽照射出最絢麗的色彩；在那裡，顯示在人們面前的是昂貴的價格、豐厚的工資、華美的商品，還有銀行，有

利可圖的工業，資本主義式的農業；那裡也是長線交易、金銀、硬通貨和信用證件流動的起止點。走在前面的一整套經濟現代特色融匯在那裡：十五世紀游歷威尼斯的人，十七世紀游歷阿姆斯特丹的人，十八世紀游歷倫敦的人，今日游歷紐約的人，這一切皆可盡收眼底。通常，尖端技術也在那裡，連同與之並蒂的基礎科學。各種「自由」亦然，它們不完全是神話，也不完全是現實。你們可以想一想人們稱之為的威尼斯的生活自由是個甚麼情形，或者荷蘭的各種自由是個甚麼情形，或者英國的各類自由是個甚麼情形！

中間國家是中心國家的鄰邦和競爭對手，到了中間國家，生活水平就差了一個成色。在這些國家裡，自由的農民很少，自由人很少，交易不能善始善終，銀行和金融機構亦不完備，而且常由外部操縱，各種工業相對來說更是傳統型的。十八世紀的法國美且美矣，然其生活水準卻不能與英國同日而語。英國人的綽號是約翰牛，約翰牛「營養過剩」，吃的是肉，穿的是皮鞋；法國人的綽號是雅克·好好先生，好好先生體質虛弱，吃的是面包，臉色蒼白，年齡未到便已呈現老態，穿的是木鞋。

然而，邊緣地區與法國又差了十萬八千里！且用一個座標來說明問題，在一六五〇年左右，世界的中心是小小的荷蘭，或更準確地說，是阿姆斯特丹。中間地帶，即二類地區，是非常活躍的歐洲的其他部分，即波羅的海和北海沿岸的國家，英國，萊茵河和易北河地區的德國，法國，葡萄牙，西班牙，羅馬以北的意大利。邊緣地區在北部，蘇格蘭，愛爾蘭，斯堪的納維亞，漢堡—威尼斯一線以東的歐洲，羅馬以南的意大利（那不勒斯，西西里）。還有，在大西洋的彼岸，歐化了的美國是典型的邊緣之地。如果剔除了加拿大和美國初始階級的英屬殖民地，那麼，整個新大陸都帶着奴隸制的標記，同樣，直至波蘭和波蘭

資本主義的動力

之外的中歐邊緣是第二代的農奴區，也就是說，農奴制如同在西方那樣大致消失之後，在十六世紀又被恢復起來。

總之，在一六五〇年，歐洲經濟世界是一些社會的重疊與共存的局面，階梯的上屬是荷蘭的已經變為資本主義的社會，下屬有農奴社會和奴隸社會。這種同時性和同步性使得各種社會的問題一起存在着。其實，資本主義正是靠這種規則的分級而生存的：外圍地區養活中間地區，尤其是中心地區。甚麼是中心？不就是統治尖頂，不就是整個大廈的由資本主義構成的上層建築嗎？觀物有變向角度，如果說中心依靠外圍的供應，那麼，外圍則依靠中心的需求，中心向外圍發號施令。弄來弄去，還是西歐將奴隸制搬到了新大陸的框架裡，而且加進了新的創造；弄來弄去，還是西歐出於自身經濟的要求將二~~三~~農奴制導入東歐。由此可以看出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論斷的份量：資本主義是世界不平等的產物；為了自身的發展，它需要國際經濟的默契。在一個顯然非常巨大的空間裡，它是專橫組織所生下的兒子。在一個狹窄的經濟空間內，它不會生長得如此茁壯。若不借助別人賣身的勞動，它大概壓根兒就生長不成。

人們通常講的是漸進的模式：社會由奴隸制發展為封建農奴制，再發展為資本主義。而上述的論點卻是另外一種解釋。這個論點強調了同時性，強調了同步性，這個同步性太非同一般了，以致於它不可能不具有巨大的意義，不過，這個論點並不解釋一切。它也不可能解釋一切。至少解釋不了我認為重要的一點，即關於現代資本主義的起因這一點，我在這裡要說的是在歐洲經濟世界之外所發生的事情。

事實上，直至十八世紀末期，直到出現一個真正的世界經濟的時候，亞洲這一邊曾有過一些組織得和開發得都很堅實的經濟世界：我想到的是中國、日本、印度——南亞諸國板塊、伊

斯蘭國家。按規矩，而且按實情，可以說，這些經濟體和歐洲的經濟體之間的關係是表層的，僅僅涉及到用以交換錢幣的奢侈品——特別是胡椒、香料和絲綢，還可以說，這一切與經濟實體的份量相比既輕且微。這是無疑的，然而，這些狹窄的、所謂表層的交易卻是雙方的大資本所獨轄的，而這一點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種巧合。我甚至最終產生了這樣的認識，即每個經濟世界常常是由外部操縱的。偉大的歐洲歷史把這一點講得扎扎實實，沒有人認為它錯誤地強調了以下的事件：伽馬(Gama)^①一四九八年抵達卡利卡特(Calcutta，印度南部大商港)；荷蘭人豪特曼(Houtman)^②一五九五年在爪哇島的大城市萬丹拋錨；羅伯特·克萊武(Robert Clive)^③一七七五年在普拉西取得的勝利使孟加拉歸屬了英國。命運是乘着風火輪而來的。命運來自遠方。

第三節

在歐洲曾存在前後相接的經濟世界，它們是由一些中心輪番造就並推動發展的，這一點我已同你們談論過。現在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七五〇年之前，這些處於支配地位的中心一直是一些城市，實際上是些城邦。關於阿姆斯特丹，可以說，到十八

① 伽馬(Gama, 1460—1524)：葡萄牙航海家，由歐洲繞好望角到印度的海路開拓者。一五二四年受命為印度總督。

② 豪特曼(Houtman, 1540—1599)：荷蘭探險家和商人。一五九六年到達東印度群島，與爪哇等地的土王建立了貿易關係，同年滿載着香料返回阿姆斯特丹。

③ 克萊武(Robert Clive, 1725—1774)：英國首任孟加拉行政長官。一七四年去印度，在東印度公司當職員。孟加拉原由莫卧兒皇帝所派的總督統治。一七五七年六月，克萊武在普拉西戰役中擊敗了孟加拉總督西拉吉·烏德·多拉，英國從此成為孟加拉的主人。

世紀中葉，它仍然以經濟統治着世界，它是歷史上最後一個城邦。在它的背後，聯合省的統治不過是個影子而已。阿姆斯特丹獨坐江山，它是從拉美的安的列斯群島，從日本沿岸，總之，從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的明亮的燈塔。可是，到了啓蒙世紀中葉，一個不同的時代開始了。君臨天下的倫敦不再是一個城邦，它是英倫三島的首都，英倫三島賦予它一個國家市場所具有的所向披靡的力量。

因此，有兩個階段：城市的建制與統治階段；全國的建制與統治階段。這一切可以一帶而過，之所以一帶而過，不僅僅因為你們了解這些熟知的事實，不僅僅因為我已談論過，還因為，在我看來，只有這些熟知事實的整體才是重要的，這是由於從這個整體着眼，我們才能以相當新的方式提出並看清資本主義問題。

直到一七五〇年，歐洲先後圍着一些重要城市轉，這些城市的角色將它們變成了大名星：威尼斯、安特衛普、熱那亞、阿姆斯特丹。不過，在十三世紀的時候，在這一等級的城市之中，尚無一個能支配經濟生活。這倒不是因為歐洲尚未形成一個有結構、有組織的經濟世界。地中海一度被伊斯蘭教征服，後來又重新向基督教徒開放，地中海以東的貿易遂向西方提供了一個遼遠的、頗具魅力的活動天地，沒有這樣一個活動天地，也就不會有名符其實的經濟世界了。兩個先導地區已顯然自成一體：南方的意大利，北方的荷蘭。整體的重心於是便固定在兩區中途的香檳與布里的交易會。這些交易會是人為的、非自然的城市，與之相連的有一個稱得上是大城市的特魯瓦(Troyes)和三個二等城市：普洛萬(Provins)，巴爾蘇爾奧布(Bar-sur-Aube)，拉尼(Lagny)。

若說這個重心在虛空之中，則未免言過其實，而且，它離

巴黎並不太遠。當時的巴黎在聖路易君主政體的光輝中，在其大學的聲名遠播中，已是一個大商埠了。人文主義史學家朱塞佩·托法寧(Giuseppe Toffanin)看準了這一點，他寫過一本書，題目頗具特點：*In Secolo senza Roma*〔沒有羅馬的世紀〕。請你們領會，這裡指的是十三世紀，羅馬的文化王位失落在巴黎手中。不過，要看到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當時巴黎的光輝與香檳的熱熱鬧鬧的交易會有着內在的聯繫，香檳的交易會是一個幾乎不中斷的國際聚會的場所。北方，即廣義的荷蘭——從馬恩(Marne)河邊到須德(Zuider)海的一大片紡織毛、麻的家庭作坊——所生產的呢絨和布匹與意大利商人與借貸人所掌握的胡椒、香料和錢款進行交換。交換雖然局限於奢侈品，卻足以啓動一台巨大的商業、工業、運輸和信貸機器，足以將這些交易會變成了當時歐洲的經濟中心。

香檳交易會在十三世紀末沒落，原因是多方面的：從一二九七年建立了地中海與布魯日(Bruges)之間的直接海運線——海路壓倒了陸路；由於有了辛普朗(Simplon)隧道和聖哥達(Saint Gotthard)隧道，德國城市之間的南北通道的作用發揮出來了；最後，意大利城市工業化了：過去，意大利城市只滿足於染印北方的呢絨，現在，它們自己也能織造了。在佛羅倫薩，毛紡工藝發展起來了。但是，最為關鍵的是，在十五世紀，嚴重的經濟危機，加之不久之後發生的黑死病悲慘疫情，發揮了它慣常的作用：香檳貿易的最強大的伙伴意大利勝利地經受了這場考驗。它變成了，或者說重新變成了經濟生活的不可否認的中心。從此之後，意大利把持了南北之間的交易。再者，經波斯灣和紅海從遠東運來的商品以及從地中海東部抵達的商隊首先給意大利打開了歐洲所有市場的大門。

實際上，意大利首屈一指的地位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由威尼斯

斯、米蘭、佛羅倫薩和熱那亞這四座强大的城市分別統領着。一三八一年，在熱那亞失敗之後，開始了威尼斯的長期統治。此番統治並不一帆風順，卻也歷時一個世紀以上。在此期間，威尼斯是支配着地中海以東地區的商埠，而且威尼斯對於全歐洲來說也是遠東搶手貨的主要集散地，歐洲各地的人都蜂擁而至。十六世紀，安特衛普取代了聖·馬可之城（即威尼斯），原因在於安特衛普變成了胡椒的儲存庫，葡萄牙通過大西洋的海路大量進口胡椒。因此，埃斯考河（Escaut，比利時稱為施海爾德河）的港口便成為大西洋和北歐交易的巨大中心。後來，多種政治原因又將熱那亞置於統轄地位。這些政治原因說來話長，在這裡就不談了，它們與西班牙人在荷蘭進行的戰爭也有關係。聖·喬治之城（即熱那亞）的財富並不僅僅建立在地中海以東地區貿易的基礎之上，還建立在新大陸的貿易、塞維利亞的貿易、從美洲礦區源源而至的白銀基礎之上。熱那亞當時成了美洲白銀在歐洲的集散地。最後，阿姆斯特丹令所有的人一致認為，從波羅的海到地中海東部，再到印尼的摩鹿加（Molucca）群島，在這樣一個廣袤的區域內，它長期——歷時一個半世紀以上——行使的主導權主要取決於它在兩個方面的無可爭辯的控制力；一方面它控制了北方的商品，另一方面控制了桂皮、丁香等「細香料」。它相當迅捷地掌握了這些「細香料」在遠東的一切貨源。阿姆斯特丹的控制已幾近壟斷，這使它幾乎處處皆可隨心所欲地行事。

讓我們把這些強可敵國的城市放在一邊，抓緊時間來談一談國家市場和國民經濟這個大問題。

由於物質生活的需要與革新，國家將政治空間演革為協調的、統一的、其活動都能向同一方向進行的經濟空間，這便是國民經濟。只有英國提前實現了這一業績。在論及英國的時候，

人們總要談到革命：農業革命、政治革命、金融革命、工業革命。在這一系列革命中，還須加上一場建立了國家市場的革命，至於給它起個甚麼名字，那就悉聽尊便了。奧托·欣澤批評了桑巴特，他是強調這項演革重要性的最初的幾個人之一。此一演革與這個幅員相當狹窄的國家擁有相對充裕的運輸手段密切相關。沿海航運之外還有密布的河流與運河網，以及大量的車輛和馱重牲畜。英國各省通過倫敦交換產品並安排出口，更何況英國很早就解脫了內部關稅和通行稅。另外，英國於一七〇七年與蘇格蘭，一八〇一年與愛爾蘭實現了聯合。

你們也許會想，聯合省(指荷蘭)早已實現了上述業績。但是，聯合省的領土乃彈丸之地，無法養活自己的人口。在荷蘭資本家的謀劃中，國內市場無足輕重，他們完全轉向了國外市場。至於法國，則面臨着太多障礙：經濟落後，幅員相對過廣，人均收入太少，內部聯繫困難，最後還有，它的中心的形成不夠完善。以當時的運輸情況衡量，國土過於廣闊了，國家也太分散，太無組織了。在一本引起許多議論的書中，愛德華·福克斯(Edward Fox)輕而易舉地指出，當時至少存在着兩個法國，一個是沿海法國，充滿活力、靈活、受到十八世紀經濟發展的直接刺激、與內地很少聯繫，因為一切視線都轉向外部世界了；另一個是內陸法國，土氣、保守、視野局限於本地、意識不到國際資本主義所能帶來的經濟好處。而政權恰恰一貫掌握在這第二個法國的手中。而且，國家政府中心所在地巴黎處於內地，連法國的經濟首都都不是。自從一四六一年建立交易會以來，里昂長期發揮着經濟首都的作用。只是在一七〇九年

資本主義的動力

和薩米埃爾・貝爾納(Samuel Bernard)^①「破產」之後，巴黎方為法國市場的經濟中心。在一七二四年改組巴黎交易所之後，這個中心才開始發揮作用，但為時已晚。馬達雖然在路易十六時期已經啓動，但卻無力推動和控制法國的全部經濟空間。

英國的命運簡單多了。英國只有一個中心，即倫敦。從十五世紀起，倫敦便是國家的經濟與政治中心。這個中心形成得很快，同時也按照自己的意願，即按照當地大商人的意願塑造着英國市場。

另外，英國的島國地位幫了它的忙，使它可與別國分道揚鑣，可以擺脫外國資本主義的干涉。一五五八年，托馬斯・格雷沙姆(Thomas Gresham)創建了 Stock Exchange(證券交易所)，這是針對安特衛普的動作。一五九七年，關閉了漢薩同盟^②在倫敦的會計所並取消了該所原主人的特權，這是針對漢薩同盟成員的舉措。一六五一年，頒布了第一個航行法，這是針對阿姆斯特丹的行爲。在那個時期，阿姆斯特丹統轄着歐洲商業的命脈。但是，英國對它有施壓的手段：由於風向的關係，荷蘭帆船經常需要在英國港口停泊。這大概就是荷蘭接受英國採取保護主義措施而不能容忍其他任何人採取保護主義措施的原因。總之，英國比其他任何歐洲國家都更好地保護了它的國家市場和它的新生工業。英國取勝於法國，其過程是漫長的，其初始是頗早的(我認為始於一七一三年的烏得勒支條約 Treaty of

① 薩米埃爾・貝爾納(Samuel Bernard, 1651—1739)：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手下的財政官。

② 漢薩同盟(Hanseatic League)：中世紀由德意志北部城市和德意志海外貿易集團創立的商業組織。到了十四世紀，參加同盟的城鎮發展到一〇〇個，形成了從俄國的諾夫格羅德到英國倫敦的貿易軸心。從十五世紀起，由於各城鎮的獨特利益超越了共同利益，同盟開始消亡。一六六九年召開了最後一次會議。

Utrecht)，自一七八六年(艾登條約)凸顯於光天化日之下，到了一八一五年便是輝煌眩目的了。

隨着倫敦登臨頂峰，歐洲和世界的經濟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因為，英國的經濟優勢也擴展到政治領導權方面，而此一優勢之確立標誌着一個綿延數世紀的時代結束了。城市統領經濟的時代結束了。歐洲雖有汹涌的來勢和貪多務得之心，它當時的一些經濟世界也不可能運籌於帷幄之中而將外部世界把握住。同樣，這些經濟世界的時代也結束了。英國取代阿姆斯特丹的成功，這不僅僅是歷史業績之重揚，而是歷史業績之超越。

征服世界是艱難的，其中不乏事變與悲劇。但是，英國的主導地位維持下來了，克服種種障礙。歷史上第一次，歐洲經濟世界排擠着其他的經濟世界，謀求支配世界經濟並在全球範圍內與世界經濟結為一體。普天之下，一切障礙都得首先為英國人，同時也為歐洲人讓路。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一九一四年。安德烈·西格福雷德^①生於一八七五年，本世紀開始時也只有二十五歲，很久之後，他懷着無窮的餘味回顧道，在一個邊界縱橫交錯的世界，他竟然只用一張名片作為身份證件作了環球旅行！這真是 *pax britannica*〔英國統治下的和平〕的奇迹，當然，不少的人為此付出了代價……

第四節

我們現在要談論的英國工業革命是一次使英國煥發青春、從而在世界上佔據主導地位的沐浴，是一份使英國走向強盛的

① 安德烈·西格福雷德(André Siegfried, 1875—1959)：法國地理和社會學家。有關政治社會學和地理經濟學著作頗豐。

資本主義的動力

契約。請你們不必擔心：我不會狂熱地、喋喋不休地投入這個歷史大題目裡去。實際上，這個大題目的討論一直延續至我輩，還在糾纏着我們。工業仍然在我們身邊，仍然是革命性的、咄咄逼人的。請放心：我只向你們闡述這場運動的初始，我避免參與英、美歷史學家率先、其他國家歷史學家隨後所投入的引人注目的爭倫。再說，我所闡述的問題只限於指明在多大的程度上英國的工業化符合我所勾畫的簡圖與模式，在多大的程度上英國的工業化納入了已經是如此富有戲劇性變化的資本主義總體歷史。

讓我們說明一點，革命一詞，在這裡如同慣常的情況那樣，是反其意而用之的。révolution，在詞源上，指的是一個旋轉着的輪子、一個旋轉着的星球的運動，即一個「快速」的運動：轉動一開始，人們便知道它會相當快地結束。而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工業革命)卻頗為特殊，是一個緩慢的運動，其開始階段不易被人察覺。亞當·斯密本人就生活在這場革命的最初迹象之中，卻對此絲毫沒有意識到。

革命的進程是很緩慢的，這就說明它是困難的，是複雜的。當前的情況不正說明了這一事實嗎？在我們眼前，第三世界的一部份國家正在實行工業化，但艱辛異常，受挫頻仍，緩慢得讓人一看就覺得很不正常。這一回，問題出在農業部門沒有跟上現代化；或者因為缺乏合格的勞動力；或者由於國內市場的需求不足；另一回，麻煩來自當地的資本家不要當地的投資，而寧取更為可靠、更有利可圖的外國投注；或者由於國家機構的浪費和瀆職；或者因為進口的技術不適合國情，或者因為進口技術的價格太貴，影響了成本；或者由於出口補償不了進口：出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國際市場跳出來與你作對並且最後得逞。革命不再是一件需要創造的事物，各種革命模式也任人取用，可

是上述種種不幸的遭遇依舊產生。乍看起來，一切本應容容易易，可是甚麼事情幹起來都難得順順當當。

實際上，所有這些國家的形勢不正使人們回憶起英國產業革命之前世界上所發生的情況嗎？也就是說，許多老的革命在技術上本來存在着成功潛在的可能性，然而卻失敗了。托勒密時代的埃及已經了解水蒸氣的力量，但僅僅用在了玩樂上。羅馬世界掌握了重大的技術與工藝成果，這些成果不止一次地穿越了中世紀前期的幾百年，到了十二和十三世紀再獲新生，然而這一切並未獲得人們的關注。在這些復興的世紀裡，歐洲成倍地增加了羅馬早已使用過的水磨房，也成倍地增加了風車磨房，神奇般地擴充了能源：這已經是一場工業革命了。中國似乎在十四世紀發明了焦炭煉鐵，但這場潛在的革命卻無疾而終。在十六世紀，深層礦井裡安裝了整套的提水、泵水和排水系統，但是，作為工廠先驅的這些首批現代化作坊，在吸引來資本之後，卻很快地成了效率下降規律的犧牲品。在十七世紀，泥炭的使用面在英國擴大了，約翰·內夫頗有道理地說這是英國的首次革命，但這是一場沒能擴展並導至大變化的革命。至於法國，工業進步的徵兆在十八世紀是清晰無誤的，技術發明一個接着一個，基礎科學至少與英國的基礎科學一樣出色。可是，決定性的步伐是在英國邁出的。在英國，一切都是自發進行的，宛如天造地設一般，而這正是世界上第一場工業革命所提出的引人入勝的問題，這場革命也是現代歷史最大的斷口。它到底為甚麼發生在英國呢？

英國歷史學家是如此大量地研究了這些問題，以致於外國史學家很容易在英國史學家的爭吵中陷入迷津，因為外國史學家理解的是每一回單獨的爭吵，而將所有的爭吵聚集在一起卻不能使問題的解釋簡單多少。現在唯一肯定的東西是，那些圖

資本主義的動力

方便的、傳統的解釋被拋棄了。人們越來越傾向於將工業革命視為一個整體現象，視為一個進程緩慢的現象，因而蘊涵着深遠的起因。

英國機械革命，即歷史是第一次大規模生產的 Boom(繁榮景象)從十八世紀末一直拓展到十九世紀開外，形成了一種奇迹般的全國性增長，發動機無一處咬剎，阻滯發展的瓶頸現象無一處產生。若是我們回過頭來參照一下我剛剛說到的當今世界不發達地區的困難與混亂的增長，英國的情況難道不是最令人驚奇之事嗎？在英國農村，男人流失一空，而生產能力卻依舊維持着。新生的企業家找到了他們所需要的熟練的或不熟練的勞力。儘管物價上漲，國內市場繼續發展着。技術也跟上來了，源源不斷地提供人們所需要的服務。國外市場一個接着一個被打開。甚至利潤下降，譬如在第一期繁榮之後棉紡工業利潤狂跌，也沒有引發危機：積累起來的巨額資本流向別處，鐵路接續了棉紡。

總之，英國經濟的各個部門都順應了產生突然大發展的需求，沒有出現阻滯，沒有出現故障，那麼，難道不應該將此歸功於整個國民經濟嗎？再說，在英國，棉紡革命是從本土、從普通生活中涌現出來的。新發現往往是由一些工匠完成的。在相當多的情況下，企業家出身寒微。投入的資金容易籌借，開始時數額並不大。在英國引起驚人變化的因素不是已經到了手的財富，不是倫敦，不是商業和金融資本主義。只是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之後倫敦才控制了英國的工業。繼商業和金融資本主義之後，很快出現了人們稱之為的工業資本主義。背負這個工業資本主義的是市場經濟的力量與生氣，甚至是基礎經濟的力量與生氣，是善於創新的小工業的力量與生氣，也是生產和交換總體運作的力量與生氣。人們以欽佩的眼光看到了這一點，

這也是一個規模宏大的例子。工業資本主義是隨着底層經濟而成長、成形和壯大的。

形勢的因素實際上將英國造就成廣闊世界的無可爭議的主人。若是沒有這些因素，英國革命肯定不會是當時那個樣子，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倫的多次征戰幫了英國革命的大忙，這是大家都知曉的。英國的棉紡織業之所以在很大的範圍內，在很長的時間裡存在着，那是因為其發動機不斷地被新開闢的市場啓動着。這些新開的市場是：葡屬美洲、西屬美洲、土耳其帝國、印度……雖然並不情願，然而全世界卻充當了英國革命的有效幫凶。

這就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一方只同意通過(當地的)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對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從「內部」進行解釋，另一方只願看到從「外部」對此予以解釋(實指帝國主義對於世界的剝削)。依我看，這場爭論是空洞的。事實並不是誰想剝削世界誰就能剝削世界。要剝削世界，事先必須擁有慢慢成熟起來的強大力量。肯定無疑的是，這個強大的力量是自身的慢工而形成的，又通過剝削他人而得到加強，在這兩個並行的進程中，它便和其他國家的力量拉開了距離。因此，上述兩種解釋(內因論與外因論)是交織在一起的，難解難分。

我到了該結束的時候了。我的講解是否已使你們信服，我不敢肯定。作為我講解的結尾，我向你們吐露我對當今世界和當今資本主義的想法，其依據既是昔日之世界，亦是昔日之資本主義，也就是我所了解的和我試圖向你們描繪的昔日世界與昔日資本主義。我現在吐露的想法能否使你們信服，我就更加懷疑了。然而，談古不正是要論今嗎？對於歷史的解釋不正須通過古今的對證而證實嗎？

誠然，今日資本主義的規模與範圍出現了令人難以置信的

變化。它是隨着基礎交換和運作手段令人難以置信的擴展而水漲船高的。但是，萬變不離其宗，我懷疑資本主義的性質產生了徹頭徹尾的變化。

三個證據支持我的看法：

——資本主義仍然建立在剝削國際資源、利用國際機遇的基礎之上，換言之，它以世界為存活的範圍，至少它是向全世界伸展的。它當前的大目標是：重整全球主義的旗鼓。

——它一貫地、頑固地依靠法理上的和事實上的壟斷，不顧在這方面反對它的激烈行動。今天，人們將其系統稱為「組織」(organisation)，這個組織繼續在繞開市場。人們認為這是個真正新的事實。然而，錯了。

——更有甚者，不管人通常怎麼說，資本主義並不涵蓋全部經濟，並不涵蓋進行勞動的全社會。它決不可能將這二者都包含在一個系統中，即資本主義的、被誤認為完善的系統。我已給你們說過的三層分野——物質生活、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及其附屬物)——現時仍然具有對事物進行區分、對問題進行解釋的非凡價值。對此價值，只要從內部了解一下這些不同層面上的某些現時的、有特點的活動，也就足以使自己信服了。在底層，甚至在歐洲，仍在許許多游離於國家財務制度之外的自身消費和服務產業，仍有許許多的手工攤鋪。在中層，以一個服裝加工廠為例吧：在生產和銷售中，它受制於嚴格的、甚至嚴酷的競爭規律。稍有不慎或懈怠，就立即潰不成軍。在頂層，我只想給你們列舉我認識的兩家大公司，它們是所謂的競爭對手，也是歐洲市場上唯一的一對競爭對手，一家是法國的，另一家是德國的。可是實際上，買主向這家或那家訂貨，兩家公司都無所謂，因為，不管在這方面採取甚麼途徑，它們的利益是融合在一起的。

這樣，我更加堅信我自己慢慢歸順的意見，即資本主義是地地道道從頂端的、或伸向頂端的經濟活動中衍生出來的。如此說來，這個强悍的資本主義是由兩層墊子托持着的，一層是物質生活，一層是結構緊密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代表的是高利潤領域。鑒此，我把資本主義定位在頂點上。你們可以責怪我的說法，但我不是唯一持此見解之人。在他一九一六年撰寫的小冊子《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兩次指出：「資本主義就是發展至最大程度的商品生產；幾萬個最大的企業就是一切，數百萬個小企業算不了甚麼。」^①但是，一九一七年的這個顯而易見的現實卻是個古老的、非常古老的現實。

記者、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在研究工作中的缺陷，是極其經常地忽視了歷史的範疇與前景。許多歷史學家不也是這樣的嗎？他們新研究的歷史時期好像是一個自在的孤立的時期，自生自滅。列寧，這個深邃的思想家，在一九一七^②年的這同一本小冊子裡也這樣寫：「對自由競爭佔完全統治地位的舊資本主義來說，典型的是商品輸出。對壟斷佔統治地位的最新資本主義來說，典型的則是資本輸出。」這些話大可商榷：資本主義從來都是壟斷的，商品和資本從未中止過齊頭並進，因為資金和信貸從來就是觸及和打開外部市場最可靠的手段。遠在二十世紀之前，資本輸出一直是一個日常的現實。佛羅倫薩從十三世紀便輸出資本了，奧格斯堡、安特衛普和熱那亞十六世紀也

① 譯注：引語中的第一句話，在《列寧全集》權威的中文版中是没有的。鑑於列寧這部著作被譯成多種語言，也許這句話在某版本內存在過，也可能是作者根據自己的理解而概括了列寧的想法。

② 譯注：作者談及列寧的小冊子及其內容時，使用了一九一六和一九一七兩個年份，其原因是，該書是列寧一九一六年上半年在瑞士寫成的，一九一七年以《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新階段》為名在彼得格勒出版。

資本主義的動力

在輸出資本。十八世紀，資本在全歐洲和全世界游動。使用金錢的方法、手段和花招並非萌發於一九〇〇年或一九〇四年，這一點還用我說嗎？資本主義甚麼花招都會要，昨日如同今日，其特點和力量在於能一招不靈，再施一招，一式無效，再用一式，能夠視情勢而十易其計，而千變萬化，自身卻能相當好地保持不變、依然故我。

至於我，不是作為歷史學家，而是作為當代之人，我所抱憾的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如同在社會主義世界一樣，人們拒不區分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在西方，對於抨擊資本主義惡行的人，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回答道，相比之下，此乃小害，是自由經營和市場經濟必然產生的負面。我對此全然不信。從一個甚至在蘇聯也能感觸到的動向來看，有些人為社會主義經濟的遲鈍而憂慮，並想給它注入更多的「自發性」（我把話說白了：更多的自由），對他們的回答是，相比之下，此乃小害，是摧毀資本主義禍害所必然產生的負面。我對此也全然不信，然而，我心中的理想社會能有嗎？無論如何，我不認為它在世界上會有許多信徒！

作了這一番泛論之後，我的講解該就此打住了。但是身為歷史學家，我還有最後一句心裡話要向你們講。

治史永遠是往復不已、從頭開始的。歷史永遠在修撰中，永遠在推陳出新。史學的命運與人類一切科學的命運無異。因此，我不相信我們現在編著的史書能夠用上它幾十年、幾百年，沒有一定不變、永遠受用之書，這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

我對資本主義和經濟的評注是基於對資料廣泛的查考和對書刊大量的閱讀，但是，到頭來，我所依據的數字還不夠多，也不夠連貫——總之，質化多於量化。提供生產曲線、利潤率和儲蓄率的專題研究、開列出可靠的企業財產清單、對於固定資

本的耗損拿出一個哪怕是約莫估計的專題研究，皆如鳳毛麟角。在這些方面，我試圖從同事和朋友那裡尋求更為準確的資料，但收效甚微。

我無良方，只好自封於我給你們講解的圈子裡，依我之見，在這些解釋之外，順着剛剛談到的方向，倒可能尋得一條出路。若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而進行分割，將事物分割成三片或三段，這就扭曲了異常複雜的經濟與社會現實，使之支離破碎。說實在話，得抓住整體才能同時理解不同的增長率變化的根由，而這個變化又是同機器的廣泛使用同時出現的。在往昔經濟的領域中，如果我們成功地運用某種國家財務制度、某種宏觀經濟所使用的現代方法，那麼，我們就能寫一部綜合的、概括的歷史。跟綜國民收入和人均收入的走勢，以新的眼光審視一部開拓性的歷史著作，即勒內·巴埃雷爾(René Baehrel)所寫的一本關於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普羅旺斯的書，力圖確定「國家預算和國民收入」之間的關聯，根據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的建議，力圖衡量因時期而異的國民生產毛值與國民生產淨值的差額，我認為他在這個題目上的假設對於理解現代的增長是至關重要的，以上就是我誠心地向年輕的史學家們推薦的任務。在我寫過的書中，我曾不時地打開一個只能讓人猜測此等景色的窗口，然而，一個窗口難敷需要。若做不到集體調查研究，至少也得進行有協調的調查研究，這是非做不可的事情。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這部未來的歷史將是萬古不變的經濟史。經濟會計至多也就是研究國民收入的起落、變化，而不是衡定國家物資的總量積累，不是衡定國家財富的總量。這個總量是可以得到的，對它必須進行研究。對於歷史學家，對於所有的社會科學家，對於所有的客觀的科學家，前面有如一個全新的美國船，永遠值得探索。

附錄
終天之見

介紹布羅代爾在生前最後
一次研討會上的言談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八至二十日，在地中海邊的美麗小城夏多瓦隆舉辦了一次布羅代爾著作研討會。這次研討會是該市的研究中心在法國文化部、研究部、教育部、外交部、大學國務秘書處等單位的支持與幫助下主辦的。在三天之中，與會者研討了布羅代爾著作中的三個大課題：地中海、資本主義、法國。

參加這次研討會的都是國際上知名的記者和學者，其中包括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他們來自歐洲、美國、拉丁美洲和亞洲。大廳裡坐滿了慕名而來的聽眾。八十三歲高齡的布羅代爾興致勃勃地聽取了與會者的見解，親切、直率而又機敏地回答了學者們和聽眾的提問。布氏是法國年鑒歷史學派第二代的台柱。傳統的史學往往局限於政治史、軍事史、外交史和人物史，而年鑒學派則將史學研究的範圍擴大到經濟、社會、甚至心理方面。布羅代爾撰寫的《地中海》和《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是近代史學中的力作。用學識淵博、思想深邃這八個字來論定這位法蘭西學院院士是恰如其分的。在這次研討會上，老學者在涉及文化、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處，還情不自禁地傾吐了幾段心曲。在研討會一個多月之後，他便與世長辭了。因此，布羅代爾在夏多瓦隆的談話，借用法國一句成語，竟成了「天鵝的絕唱」。

研討會第二天的議題是資本主義。筆者認爲，摘要介紹會上的發言與辯論或許有助於讀者對本書內容的理解。在一九八五年那個時候，至少在公開的場合，還沒有聽說有哪一位大政治家或哪一位大學者曾預見東歐的劇變和蘇聯的解體。在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裡，對於市場的研究處在一種欲言又止、躲躲閃閃的狀態中。而布羅代爾和他的朋友沃勒斯坦等人早在此之前便明確將市場與資本主義區分開來，這充分顯示了這批人學術功力的深厚和思想的銳敏。今天回頭察看，更覺其難能可貴。

這裡要作一點說明：本文是這次研討會關於資本主義部分的分題概括。採用的是意譯而不是直譯的方式。在完全忠於原文的前提下，選擇意譯的決定無非是方便中文讀者的閱讀，筆者在這裡面未作任何詮釋，更無絲毫的添枝加葉。

在這次討論會上，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社會學教授、該校「費爾南·布羅代爾研究中心」主任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對於布氏關於資本主義的著作作了一個畫龍點睛的闡述，並且由此指出了其頗具開拓性的意義。

沃勒斯坦說，四十年前，市場在資本主義中的作用看起來是相當清楚的。市場不但將資本主義確定為自身運作的關鍵因素，而且還用兩個相反的命題給資本主義定位：一方面是處於上游的封建主義，另一方面是處於下游的社會主義。那個時候，人們傾向於把封建主義說成是一個市場前制度，把社會主義說成一個市場後制度。今天，已經不可能再使用這種圖解作為分析問題的基礎了。這倒並不是因為這個圖解過於簡單化了，而是因為它顯然是錯誤的，至少有三點錯處，分別涉及三類社會。

首先，自從一九四五年以來，對於封建社會的研究大大地發展了。研究向我們表明，根本不可以將封建社會看成是在自然經濟範疇中的一個封閉的、完全自給自足的結構。實際上，在封建社會裡到處都有市場。當然，這樣一個市場體系與資本主義有很大的不同。商品化尚未向全球方向推進。一般來說，市場或在當地，或在遠處，很少形成「區域性」的結構。其次，真正存在於世的社會主義近年來對於市場表現出某種經驗論傾向。第一，分析家們越來越一致地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國家並沒有真正地、最終地擺脫世界市場；第二，在每個社會主義國家內部都進行一場長期的辯論，其主題是，在國內市場實行某種放開會得到甚麼好處。在辯論中甚至產生了一個新概

念：「市場社會主義」。最後涉及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綜上所述，封建社會的現實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現實都否定了上面提到了理論圖解。其實，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也同樣表明了此一理論的錯誤：布羅代爾的著作正是在這方面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他最近出版的三部著作的精華就在於從資本主義的現實中區分出三個要素，而他只把「市場」這個字眼使用於其中的一個要素。特別要指出的是，布羅代爾重新確定了市場和壟斷的關係。過去，人們通常將競爭和壟斷看成是資本主義市場的兩極，而布羅代爾則視之為不斷鬥爭的兩個結構，在這兩個結構之中，他只把壟斷定性為「資本主義」。

這樣一來，他就扭轉了知識界討論的方向。他不認為市場是資本主義體系的關鍵因素，而將此要害作用賦於壟斷。這是一場看法上的革命。

沃勒斯坦指出，從布羅代爾的著作中可以獲得三大教益，這三大教益皆與人們過去所認可的思想相悖。過去，人們是將資產者和資本家分類的，將他們分成商人、企業家和金融家。為了確定在現代史的某個時期內哪一個部門支配着另一個部門，人們曾經花費了並正在花費着多少筆墨啊！關於某種自然歷史的模式，人們創立了那麼多的理論，說是資本有一個從商業到工業、再到金融的發展過程。對於農業資本家的作用和存在，有着多少模糊認識啊！

然而，這一切是個子虛烏有的問題。布羅代爾明確地指出，大能人總是試圖包攬一切的：批發、生產、金融，他們甚麼都做。只有在一切領域中都佔上風的時候方可希冀獲取壟斷利益。只有落伍者才從事專業經營，也就是說，成為專業的商人或企業家。因此，要區分的不應該是商人、企業家、金融家等等，而是專業戶和非專業戶。一個是行業的區分，一個是大與小、世

／ 界性/地方性/國家性、壟斷部門與競爭部門的區分，這第二個區分才是布羅代爾所稱之為的資本主義與市場的區分。

第二個教益並非專屬布羅代爾，然而，布羅代爾的著作能夠使我們克服某種意識形態上的障礙，這種障礙阻止人們承認這樣一個實情：一切壟斷皆具政治性。如果沒有一種政治保證，你就永遠不能支配經濟，永遠不能扼殺或限制住市場的力量。要想設立非經濟性的壁壘，不讓人家涉足經濟交易，要想將非份的價格強加於人，要想保證非優先性的採購，不依靠某個政治當局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認為沒有國家的支持、甚至在反對國家的情況也能成為一個（布羅代爾定義下的）資本家，那簡直是一個荒謬的想法。

沃勒斯坦說，如果這是確切的話，那麼，當今世界上的左派與右派的政治鬥爭的全部含義也就應該改變了。他們的鬥爭是圍繞著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合法性嗎？不是的，過去從來不是，現在仍然不是。國家是資本主義制度運作的一個組成因素。雙方的辯論無非是圍繞著這樣一個問題：誰是國家即時行動的受益者。這樣一種看法幫助我們破除政治辯論的神秘化。

最後一點教益是，布羅代爾可使我們收斂對於重大技術進步的熱情。重大的技術進步是亞當·斯密和卡爾·馬克思的信徒們所津津樂道之事。實際上，每次技術大突破對於壟斷領域便是一次新的推動。每當市場擴大了股民的人數、降低了成本、價格和利潤，因而也就侵佔了壟斷的地盤之時，有人（是誰呢？）便醞釀搞一項技術飛躍，以此再建一個封閉的、在三十年內可獲高額利潤的領域。

沃勒斯坦說，他贊揚了布羅代爾，但同時也要指出一種危險，即濫用布羅代爾論點的危險。一些人渴望絕對的自由，反對壓制他人的大亨，這些人很容易將布羅代爾的論點引向一曲

新的（不切實際的）浪漫主義。沃勒斯坦說，為此，他想談一談法國大革命的著名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在過去近二〇〇年的時間裡，人們一直把自由、平等、博愛分析為三個不同的概念，並且一直在研討這樣一個問題：在多大的程度上這三個概念是協調兼容的。譬如說，自由和平等難道不正是導致博愛的反面嗎？等等等等。也許，根據布羅代爾對於資本主義的分析，我們應該對這三句口號進行重新認識。市場是小人物的領域，是自由的領域，市場進行着不斷的鬥爭，反對壟斷，而壟斷是大人物的領域，是壓制他人的領域，壟斷只有依靠國家的活動才得以存在。在此情況下，反對政治不平等的鬥爭，反對經濟不平等的鬥爭和反對文化不平等的鬥爭不正是同一場鬥爭嗎？壟斷之所以能處於統治地位，是因為它在經濟角鬥場上否定了自由和平等，進而也就在政治舞台上和文化舞台上否定了自由和平等。沃勒斯坦強調說，在我看來，參與布羅代爾所理解的市場世界就是意味着為世界的平等化而鬥爭，即為人類的自由與博愛而鬥爭，因為，這樣一場鬥爭的邏輯不允許世界上存在着人下人。這是一個（對於傳統觀念的）扭曲：布羅代爾定義下的市場所取得的勝利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表徵，反而是世界社會主義的表徵。這是一個多麼美好的扭曲啊！

沃勒斯坦說，我們討論的顯然不是過去的歷史，而是很難創建的未來。讓布羅代爾所界定的市場取得勝利決非易事。從某種意義上講，過去五〇〇年的歷史乃是這個市場屢屢失敗的歷史。布羅代爾給予我們的唯一希望是，這個市場，或者更確切地說，組成這個市場的人，從未認輸。每天清早，這些人又重新投入同一場艱巨的鬥爭，為了壓制那些壓制他人的人，在經濟上控他們的牆腳，在政治上破壞他們的基礎。

沃勒斯坦的這番講話引起了聽眾的熱烈反響。

經濟世界：中心與外圍的差距

這次研討會關於資本主義的討論是由經濟學家、法國《世界報》的著名記者保爾·法布拉(Paul Fabra)主持的。

在開場白中，法布拉贊揚了布羅代爾的學術成就，稱布氏是「一位非凡的指導者」。他還指出，大城市的「組織作用」，連專業的經濟學家都忽視了，卻被布羅代爾所揭示。布氏即使不是第一位，也是最初的揭示者之一。這裡所說的大城市即中世紀的威尼斯和熱那亞、十六世紀的安特衛普、十七世紀的阿姆斯特丹、爾後的倫敦和今日的紐約。

然而，法布拉對於布羅代爾的「市場與資本主義有別」基本論點表示了異議。他說：「根據布羅代爾的說法，資本主義是一個上層建築，應當細心地將之區別於『市場經濟』。在《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這部重要著作中，作者劃分出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的各個階段，指明了這兩個假設有別的現象（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地位和性質。這個論點所帶來的問題多於它所能解決的問題，這也正符合一切大的解釋定式的情況。」法布拉接着說，布羅代爾告訴我們，一種解釋定式如同一艘船，先在陸上建造，然後下水。這船能浮在水面嗎？能航行嗎？現在我們也要問，他的船能開動嗎？

法布拉說，布羅代爾的論點令人生疑，其原因可能是在涉及宏偉的交換歷史時缺少了一個明確的交換概念。他說，布羅代爾接受了（美國經濟學家）約翰·加爾布雷思(John Galbraith)的論點。加爾布雷思認為，大企業有實力「統轄」市場。布羅代爾甚至這樣寫道：「對於大企業來說，經濟規律是不存在的。」布羅代爾的「資本主義外向性」的論點正是建立在這種說法的基礎上。

法布拉順勢而下：布羅代爾把市場經濟視為聯繫生產世界和消費世界的保證。從某種意義上說，布羅代爾所說的市場經濟是生產者在思想上仍然關心使用價值的一種經濟，而資本主義則只關心交換價值。在這個概念中，難道沒有一點對能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間接讚頌嗎？

法布拉提出了兩點具體的質疑，一個是經濟世界的中心與外圍的差距問題，一個是競爭與壟斷的關係。

法布拉指出，根據經濟理論，市場有助於將成本拉平，也將利潤拉平。而布羅代爾卻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引用了馬克思主義的想法，即建立在平等關係之上的交換導致了不平等的建立。布羅代爾有一種看法，一個經濟世界的外圍注定比它的中心地區貧苦。「難道人們能夠二話不說地接受這個看法嗎？在我看來，事實部份地否定了這個看法。今天，西方世界是圍繞着美國而組織起來的，歐洲人的生活水平實際上已趕上了美國人的生活水平，在某些歐洲國家，甚至超過了美國人的生活水平。」

布羅代爾在答復中首先指出「法布拉試圖責難我們所稱為的經濟世界。開門見山地說吧，因為這個詞組不屬於經濟學家們的地道的語言……如今有一個經濟世界，這就是西方世界。西方世界構成了一個相當緊湊的經濟世界，其中心暫時位於紐約，歐洲所具有的不是一個外圍的地位，而是一個『中心周圍』的地位。保爾·法布拉提出了一個他認為是決定性的論據，對我說，『這個半外圍的歐洲的生活水平已經趕了美國的生活水平，這就與你新提出的見解產生了矛盾。』我不認為你的論據很充分，因為你只用了一個指標，即歐洲的生活水平（我情願德國、瑞士、甚至法國的情況如此，但肯定英國不然）與美國的生活水平相等。但是，要知道，這是是不是一個長期的動向，是一個長

資本主義的動力

期的現實還是一個暫時的現實。需要了解這個水平差維持得住還是維持不住。對於一個經濟世界，要靠長期判斷。你若能回答我，我將感到高興。」

法布拉對老學者說，你的論據太狡巧了，我回答不了，你自己也回答不了。

布羅代爾接應道：「不，我能夠回答！因為結局還沒有出現。過五十年再看……」

法布拉：如果需要等五十年再看的話……

布羅代爾：我有很大的耐心，我能等五十年！

法布拉：如果在經濟世界裡有一個統治中心，其生活水平高於周圍世界，更高於邊遠地區，這種水平差可能由於外原性因素，也就是說，非經濟性因素。而經濟性因素是推動事物走向均等化方向的。在這方面，市場發揮着某種作用。當我還是年輕記者的時候，人們對共同市場（即歐洲經濟共同體）談論頗多。當時，有一個強烈反對共同市場的理由，那就是認為不可能把一些很興旺的地方，如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德國的魯爾地區，和落後的法國、更加落後的意大利連在一起。認為它們之間的差距只能擴大。孟戴斯一弗朗斯曾預料法國的工人會大量涌向魯爾。事實上，我看到的卻是差距的縮小。

布羅代爾：你把共同市場視如一個經濟世界，而它不過是經濟世界的一角……

法布拉：在你論證中，存一樣東西使我為難。假若五十年後水平差出現了，換句話說，西歐的生活水平比美國的低了，那就說明你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出現了相反的情況，你就說經濟世界的中心變了。總之，在任何情況下你都佔理。

布羅代爾：保爾·法布拉，令我吃驚的是你對「外原性」這個字眼的用法。你要說明的意思似乎是，當一些非經濟性的

事實參與到經濟之中時，這些事實就是外原性的。很顯然，我們可以說，歐洲在經濟世界中的地位不是取決於非經濟的東西，而是取決於其整體經濟。一個經濟世界的中心一定是一個高於別的地方的地區。這並不意味着美國的中等生活水平高於歐洲的中等生活水平。高級地區是這樣一個地區：高級地區面臨的問題與外圍地區或半外圍地區所面臨的問題是不一樣的。

壟斷與競爭的關係

法布拉向布羅代爾提出的第二點具體質疑涉及到競爭與壟斷的關係。在現實生活中，一方面有生產，另一面有交換。對此，法布拉說：「經濟的進步不正是在於逐漸地將生產世界拖入交換帝國嗎？不正是分工的結果導致了任務的專業化和企業的多樣化嗎？跨國公司將它們的工廠和車間分散在多處，正是為了從成本的差異中汲取最大的利益，它們是這方面運動的行家裡手。它們有沒有能力擺脫市場規律？這個問題用不着提出，誰都能夠看到，它們存在的根基正是充分地利用了市場規律。費爾南·布羅代爾並非沒有看到這個現象，但是，他在分析此一現象時只在外圍繞了圈子。費爾南·布羅代爾認為，市場經濟受競爭的制約，而掌握了大量積聚資本的資本主義都可以（隨心所欲地）運營，經得起風險，可以搞鬼作弊……然而，最大的企業都是在國際市場上展開活動的，而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即便不是無時無刻地、也經常是最為激烈的。根據布羅代爾的理論，在國內市場上的競爭是小店鋪的事，不是超級市場的事。當一位作者（指布羅代爾）寫道，競爭處於壟斷之下，只供小的和平庸的企業之用，那麼，他所參照的是一種甚麼樣的競爭概念呢？人們所面對的難道不是一個矛盾的、感情成分大於科學成分的概念嗎？」

以上的話是法布拉在開場白中講的。在後面的辯論中，法

資本主義的動力

布拉對此問題又作了多次表述。他對布羅代爾說：「你認定在你所稱之為市場的層面上，競爭是透明的，但市場之上的層面，競爭就不是透明的了。極而言之，能不能把這個說法翻轉過來？實際上，在初陋的市場上，透明度並不強：一些小企業進入了大多數的市場，它們連會計制度都沒有。在大企業中，可以認定，透明度少說也是相等的。」

這時，布羅代爾承接過法布拉的這個問題，回答道：「這是會計的透明，而不是運營的透明。財會只是構築運營的一種方式，或者換句話說，是一份資料而已。」

法布拉並不拘泥於這個細節，繼續申明自己的觀點：「我還是要說，上層是會使用、利用市場規律的；它懂得能從中獲取甚麼，因此，它把這些規律拉向自己。（問題的結論）這一步很快就可跨越過去了……不過，我不主動跨越，我只想簡單地說，跨國公司十分了解市場是如何運轉的，它們有能力將它們的投資與生產配置到能夠謀取最大利潤的程度。這絲毫不意味着它們凌駕於市場規律之上，我們眼下所經歷的危機證明了它們是何等脆弱。」

法布拉進一步闡述了他的見解，他強調說：「資本主義是一種交換經濟，因此也就是市場經濟。」

布羅代爾答道，那就更換一下「市場」這個字眼吧！不管怎麼說，有兩種（不同的）交換經濟。一種是透明的，其代表便是過去的交易會和市場，另一種是不透明的，其代表便是當年阿姆斯特丹、威尼斯、安特衛普、馬賽的大商人。

法布拉仍然未被說服，反駁道，這只不過證明市場尚不完善而已。他還說，大經濟學家總還是了解資本主義的發展的。他把李嘉圖視為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李嘉圖曾經說過，一切市場都是壟斷性的，其壟斷僅只短期而已。李嘉圖認為，只要投人

到交換的過程中，壟斷的地位就保不住，有人能維持得久一些，另一些人只能維持幾天，甚至幾個小時。

這時，沃勒斯坦參與交鋒，針對法布拉的論點說了自己的見解。他說：「(壟斷可能只維持幾天)但是，在短期內實現的利潤卻不止維持幾天，而是維持幾十年。就以鋼為例吧。一〇〇年前，鋼的生產是很具壟斷性的。「卡特爾」這個字便是由此經歷產生的。一些大公司壟斷了鋼的生產，從中賺得了巨額利潤。但是，由於需求面對着的市場是如此的廣闊，以致於大家紛紛煉鋼：先是印度，後是南朝鮮。結果，出現了一個真正競爭的局面。美國的、法國的、英國的、日本的大公司便放棄了利潤降低了的鋼產，將此留給了他人。今天，電腦還是個壟斷，明天，將是生物技術或別的行當。為了獲取大利潤，人們危及了壟斷，但是，在失去壟斷的時候，大錢已經賺到手了。」

布羅代爾聽後道：「沃勒施斯坦的語言正是我的語言，而不是你的語言。保爾·法布拉，『市場』這個字眼幫着你跟我們唱反調，卻無助於你理解我們的意思。」

法布拉：「它不是幫我唱反調，而是幫我為你們的言論定位。依照您所選擇的長期觀點來看，你們的言論並不絕對否定市場規律。以鋼為例，若看過去的五十年、甚至一〇〇年的情況，它表明，李嘉圖默認的先壟斷、後市場的輪轉是存在的。」

最後，布羅代爾就此主題作了一個概括性的發言。話並不長，但給人的感覺是，可能因為時間的關係，他不再細究具體的問題，而是直抒胸臆。他說：「對我來說，在經濟領域內，高層次運營的特點就是從一種壟斷轉向另一種壟斷的本領……保爾·法布拉剛剛提到我看重長期過程。並不是因為我看重它，它就具備了特殊的價值，而是因為(研究問題不可僅僅着眼於短期的、孤立的事件)長期過程乃是人類深刻的歷史……長期過程是

資本主義的動力

甚麼？長期過程是我所刻劃的（歷史）坐標的軸線，我是據此提出這類或那類問題的。你失去了一種壟斷？沒關係，再掌握另一種壟斷便是了！一種壟斷的失落便是一種死亡，資本主義的死亡，這個資本主義是祖父和父親的資本主義，而不是兒子或孫子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方便之處和它的優越性便是選擇的可能性。最有實力的非專業戶思情道，我們在幹我們的營生，我們不會罷手，我們正專心致力於此。關於跨國公司，它們今天所體現的不是活力的「傑作」，更像是一種在經濟最高層面上的列了項的企業。大企業從來就不是最深刻的技術演變的發源地。最深刻的技術演變來自基層。大企業對於這些演變是了解的，但是，當老技術尚能使它們謀取一定的利潤時，它們是不會利用這些技術變化的。」

資本主義：以賭設喻

法國歷史研究中心研究員熱拉爾·若爾朗 (Gérard Jorland) 在發言中提出了兩個頗有趣的問題：一個是資本主義的運作是否是作弊（或曰弄虛作假）的機制；另一個是資本主義是否與當今世界的經濟不平等現象有關。

若爾朗首先肯定了布羅代區分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正確性。他說，連經濟學家們也承認有兩種競爭，一種是完全競爭，即自由貿易，另一種是不完全競爭，即壟斷性的競爭。布羅代爾解釋說，市場受（完全）競爭制約，在那裡進行的變換是平等的，而資本主義則製造和利用壟斷局面，這就產生了不平等的交換。那麼，我們想知道，在資本主義這個層面上，交換是一場真正的弄虛作假嗎？是一個作弊的機制嗎？我對此存疑，因為，我不能理解一個像資本主義這樣的長期結構會建立在一個弄虛作假的基礎上。美國的一個諺語說，可騙一人於永久，可

騙衆人於一時，卻不能騙衆人於永久。

對此，布羅代爾答道：我把資本主義看成一個上層結構，弄虛作假是這個結構的特性之一。資本主義不會在任何弄虛作假面前退縮。弄虛作假這個詞有道德判斷的含義，使用它是不適當的。這個詞是我使用的，因此我是罪魁禍首。資本主義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壞的，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弄虛作假者。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對我們來說，問題不在於對它進行判斷，而是弄懂它是怎麼回事。

若爾朗提醒布羅代爾，他也說過，「資本主義是個作弊的機制」。（筆者注：在法文中，jeu是個多義詞，它具有遊戲、比賽、賭博、規則、機制、作用、手法、關係等意思。在使用中，有時它是確指的，有時它是雙關的、甚至多義的。）

布羅代爾答道：「作弊」這個字眼也暗含着一種判斷。那麼，就讓我們說資本主義是個不同的機制，是一種不同的遊戲吧！在經濟的三個層面上，一個層面玩的是多米諾，另一個玩的是羅多（一種摸子填格遊戲），第三層玩的是國際跳棋。玩法各異。

若爾朗說，使用賭博理論思考經濟問題是個內含豐富的想法。資本主義的機制與市場經濟的機制是不同的，這個不同可以挪用到賭法的不同上。贏錢的機運率可以用數學理論表示，這個理論區分兩種賭法。一種是純粹的賭，從長期觀點來看是一種公正的、穩定的賭博（筆者注，如中國的擲色子）。另一種，像數學家所說的那樣，則摻入了賭家的技巧（筆者注，如中國的麻將），即一種不穩定的賭博。

對於若爾朗的闡述，布羅代爾甚為欣賞。他說：「你以賭博理論作為參照，這是很完美的，因為它不牽扯任何道德上的判斷。」

資本主義與世界上的經濟差距

若爾朗在發言中還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當今的世界上，在地區之間和國家之間存在着差距，或曰經濟上的不均等，這是不是由於資本主義造成的呢？他說，回答是否定的。以下是他講話的主要內容：

現代世界不同地區的不平等現象是由歐洲的統治造成的嗎？費爾南·布羅代爾曾說，歐洲的統治是「世界歷史的難解之結……是現代世界歷史的實質問題」。

世界的不均等是一個歷史問題，是一個歷史事實。既然如此，它就有一個出現的時間。為此，我想借用保爾·貝羅克(Paul Bairoch)的估算。他查明：用現在的市價計算，在一八〇〇年的時候，世界各地區（歐洲、中國、印度）的人均國民產值約二〇〇美元，都差不多。可是到了一九七六年，西歐達到二三二五美元，中國和第三世界國家才三五〇美元。換句話說，在一個半世紀多一點的時間裡，均等的局面變成了現在不均等的局面。世界的這種不平等有個原因。原因何在？那就是人們稱之為的產業革命。

何謂產業革命？如何理解它？我只引用費爾南·布羅代爾明晰的解釋也就夠了：產業革命就是由木柴和木炭文明過渡到鐵器和煤炭文明。這裡借用布羅代爾的兩個數字：一七八九年，歐洲燃燒了兩億噸木柴，到了一八四〇年，便降至一億噸。一七九〇年，歐洲生產了六十萬噸鐵，一八一〇年升至一一〇萬噸，一八四〇年進一步達到二八〇萬噸。是技術的變化嗎？當然是，但它在經濟上產生了後果，若是依據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snets)的解釋模式，人們對此後果是很容易理解的。庫茲涅茨以下述的方式解釋了十四世紀以前的前工

業化社會和當代的工業經濟之間的大動蕩(我且將之簡化至極)：在前工業化社會裡，全部的積累資本是毛值資本，而當代西方的經濟中，全部積累資本為淨值資本。毛值資本與淨值資本的差別就是其價值的降低。換言之，產業革命之前，社會需要進行儲備，需要從消費中留取一些財富，而我們現在也需要這樣做，需要留取同樣多的財富，但是我們留取為的是日後增加新財富，而他們留存僅僅是為了維持生產機器的運轉。在當時的社會裡，一切生產工具都是木製的，不結實，易損壞；在當今社會裡，生產工具非常耐用，以致於它們的經濟壽命短於它們的技術壽命。比如說，今天在工廠裡安置一台機器，可用五十年，然而八年之後便撤換了，這並非因為它不能用了，而是因為又有了吸收了技術進步的新機器。更換設備導致生產能力的提高。正是這種變化，這種固定資產的演變才使得資本主義從十八世紀的前商業和金融資本主義過渡為工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是以主要為內原性的方式積累資本的。

步入鐵器文明，這標誌着經濟上的變化，這種變化本身具有其經濟原因。如果說，到了十八世紀人們才會用煤炭製鐵，那是因為：當時英國的燃料是木柴，而生產木柴的老方式的成本變得太高了。那時候，瑞典壟斷着鐵的大量生產，瑞典遂成為令英國生畏的強國。英國因此應該找到擺脫瑞典壟斷的辦法。這構成了一個壟斷性競爭的例子。換言之，在資本主義中有一種競爭形式，即壟斷之間的競爭，通過減少生產成本來爭得霸權地位。

在人們所稱之為的「棉花革命」中，存在着一模一樣的現象。為什麼十八世紀時在棉紡工業中推行了機械化？因為印度是頭號紡織品生產國。英國紡織工人的工資是很高的，他們進行鬥爭，反對削減工資。因此，對於英國來說，反對印度壟斷的鬥爭

資本主義的動力

只有一種方式，那應當是引用機器。這是另一個壟斷競爭的例子，令人更為吃驚，因為印度紡織品在歐洲市場上的壟斷不是印度人主動搞的，歐洲人自己才是始作俑者。實際上，把印度紡織品輸入歐洲的正是英國和荷蘭商人。同樣，今天第三世界新興工業國的競爭是由中心國家的資本家挑動起來的。

那麼，是不是進行作弊的資本主義造成了世界的不平等呢？我不這樣認為。造成這種不平等的原因恐怕是我們文明的物質基礎改變了。資本主義有金融的、商業的、工業的形式，在產業革命之前和產業革命之後，它的運作規則是一樣的。

對於若爾朗的這一番宏論，布羅代爾沒有表示異議，而是給予了總體的肯定。布羅代爾說：「我認識他好久了，我們經常一起討論問題。我從未聽過他像今天這樣漂亮的論述。但這也不意味着我完完全全地贊同他。」

雜談與隨感

在研討會上，學術性的闡述僅是布羅代爾談話的一個方面。從這裡，人們可以看到他治學的嚴肅與冷靜。另一言面，在涉及到諸如社會與文化等問題時，他娓娓表露了他多年觀察與思索的感悟。從這裡，透過他自己推開的一扇心扉，人們至少看到了他内心世界的一角，看到了一位老學者對於人類社會的沉鬱憂傷和對於人類前途的熱忱企盼。既要讀作者之書，亦須知作者之人。出於這一目的，特將他這方面的談吐內容摘錄如下：

——關於不平等問題。在回答法布拉的質疑時，布羅代爾說：你，保爾·法布拉，你試圖通過經濟規則來解釋交換的不平等。這是經濟學家的缺點。你提出了一種內原性的解釋，而一個像我這樣的歷史學家卻傾向於從經濟範疇中走出來，去尋

求外原性的解釋。我看到，經濟的不平等是社會不平等的移位。就我所知，人類社會沒有一個是平等的。當今世界上沒有，在歷史學家們掌握的歷史上也沒有。原因何在？在人文科學領域中，甚至可能在精確科學的領域中，你提出了一個問題，解決了一個問題，接着就會引出另一個問題。社會的不平等，我在人類最初的社會中就看到了，在歷史本身之前就存在着，這樣，不平等便作為一個基本問題提出來了。說起來會使你們發笑，我用社會的動物性來解釋這一基本問題：既然人是一種社會動物，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就在集體中生活，他便是這個集體的受害者。沒有不平等，沒有等級，也就不成其為集體。經濟上的不平等是社會不平等造成的後果。

有位聽眾問，既然由於人的社會動物性造成了永恒的社會不平等，是否要逆來順受呢？根據已經分析的事實看來，一個歷史學家不應該只是提出他思考的驗證，而應提出別的東西，以便承擔更大的責任。

對此，布羅代爾答道：「說得對，在我的一生中，我只有一兩次親自投入（左翼運動）。被觀察到的史實是脆弱的，它們對於現今並非總有用處，它們也滲透不進現今。為了求得諒解，我想告訴你們，我對讓-保羅·薩特一貫十分讚賞。我不認為他甚麼都對，當我近察他的思想時，我發現，與我相比，他經常是錯的。但是，對於他一貫的投入（左翼運動），我是一貫欣賞的。他一貫投人，我卻不然。這是個缺點，我承認。」

——關於人類的勞動與消閒：「供」增加了，「求」便隨之增加。「求」能夠吞掉一切，以致於，對於未來最為危險的事，就是出現過多消閒的時候。人們是注定要勞動的呀！勞動太能使人忘卻命運啦！有朝一日，若是沒有了這層護欄，若是

有了太多的消閒，會出現甚麼情況呢？文化政策是依據消閒娛樂而制訂的，我不知道它將會帶給我們甚麼。我懼怕硬造出來的文化。

——關於未來與自由。有一位聽眾問：歷史的記憶是否決定着我們的演進？布羅代爾答道：很不幸，是這樣的。但是，個人的演進，一個社會的演進，一個國家的演進，你指的是甚麼呢？如果涉及的是一個人數相當多的群體，那麼，儘管它的意志堅強，儘管它進行試驗，儘管它具有把事情辦好的願望，儘管它有變革意念，儘管有革命衝擊，它卻有些像一隻被河水載運着的木筏。河水流動得不快。水流若是快的話，人們早就觀察到深層歷史的現實了。人們沒有觀察到這一點，那是因為水的流速幾乎是察覺不到的。在我提出的觀念和理論中，我的立場是反對人類的廣闊自由的，這也是我最大的悲傷之一。每當我就此思索之時，（我看到）人類的自由越來越狹窄。很不幸，恐怕我沒有看錯。

——關於精神生活。一位聽眾問：根據你的智慧和你對緩進歷史的了解，你能給未來開出何等良方？布羅代爾答道：這是個絕妙的問題，只有問上帝才能得到答覆……問題提及了我的「智慧」。一個人對於自己明智，勉強說得過去，不過我也存疑；對於別人明智，這就更加困難了；若是對未來明智，那是不可能的。我懂得，我們的社會需要一種奇特的食糧。天主教的沒落——臨時也好，長久也好——造成了一個可怕的真空。絕對需要將之填補起來，使用好的填料，也可能是壞的填料。因為，人不可或缺神奇之物。人不可能停止虛構，不可能停止證明其存在的合法性。請放心，只要有人在，社會有心福的需求，

就會有理想主義的要求。誰來提供心福呢？由社會本身、由文化來製造。讓我們信賴文化吧，或者讓我們不要信賴文化吧。難哪！我正在探討法國的宗教史。這部歷史表明，每當宗教出了「毛病」的時候，就有某種替代物。必定會有替代物的。這代表著一種努力，我懷疑它能成功。我是悲觀的。我的智慧？你們看，我的智慧是行之弗遠的呀！

——結束語。在研討會最後結束的時刻，主持會議的阿爾貝·迪魯瓦問布羅代爾：「三天下來，感覺如何？」老先生回應道：「很開心。一些我喜歡的人事前對我說，『別像平日那樣不講道理』。你們認為我聽從了他們的勸告了嗎？」